

北部湾畔起风雷

——中共遂溪西北区革命斗争史

中共遂溪县委党史研究室

目 录

引子 (4)

上篇 抗日壁垒

一、建立党组织和两面政权 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8)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 (8)

 (二) 大办民众夜校 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9)

 (三) 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 (12)

 (四) 两面政权的建立及其作用 (13)

二、执行“十六字”方针 积极发展新地区 (14)

 (一) 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来临与党组织采取的对策 (14)

 (二) 调整干部 发展新地区 (15)

三、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 (16)

 (一) 雷州半岛沦陷后西北区的局势 (16)

 (二) 组织民众 联防自卫 (17)

 1. 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 (17)

 2. 联防自卫 英勇打击日伪军 (19)

 (三) 以老马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 掀起抗日武装斗争高潮 (21)

 1. 老马抗日武装起义 (21)

 2. 粉碎日、伪、顽军的围剿 大力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23)

 (四) 成立抗日民主政权 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25)

 1. 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和活动 (25)

 2. 保卫根据地 迎接抗战最后胜利 (27)

下篇 解放洪流

一、调整干部 精简武装 坚持隐蔽斗争 (31)

 (一) 抗战胜利后的基本形势 (31)

 (二) 大量调整干部及其活动地区 (32)

(三)精简武装 化整为零 坚持斗争	(33)
(四)继续建立“两面政权”	(34)
(五)反“清乡”扫荡的斗争	(35)
二、健全党政机构 加强根据地建设 掀起武装斗争新高潮	(36)
(一)全国内战爆发后的形势	(36)
(二)恢复公开的武装斗争	(37)
(三)掀起武装斗争新高潮	(38)
1. 区乡村队的建立和发展	(38)
2. 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	(39)
(四)建立健全党组织和人民政权机构 建设和 巩固游击根据地	(40)
1. 区乡村党组织的普遍恢复和健全	(40)
2. 区乡村人民政权及其附属机构的建立	(41)
3. “清算”斗争与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	(43)
三、巩固党政组织 横扫反动势力 解放西北区	(44)
(一)主力部队东西挺进前后的形势	(44)
(二)整顿巩固党组织和人民政权	(45)
(三)建立主力连和开辟新地区	(46)
(四)筹集军粮 自制被服 支援前线	(47)
(五)分化瓦解反动势力 解放西北区	(48)
四、加强解放区建设 支援大军解放雷琼	(50)
(一)保十团起义后的形势变化	(50)
(二)加强本区建设 大力支援前线	(51)
(三)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争取尹爵卿起义	(52)
(四)广泛发动群众 全力支援解放海南岛	(53)

附 录

西北区党组织及其领导人更迭表	(55)
西北区人民政权机构及其领导人更迭表	(57)
西北区主要人民武装序列表	(59)
编后话	(63)

引 子

西北区，位于遂溪县西北部。历史上，遂溪县的行政区划并没有“西北区”的设置。“西北区”的称谓，源于1945年2月中共遂溪县党组织在界炮山家村成立的“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当时的西北区，包括现在的界炮、北潭、杨柑、北坡、草潭、下六等6镇及沙古镇西部、廉江安铺镇南部，纵横600平方公里左右，共400多条自然村，约8万人口。1947年7月，遂溪县党组织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以涧水河（又称杨柑河）为界，成立了西区、西北区2个区委会，河南部的党组织归中共西区区委领导，河北部的党组织归中共西北区区委领导。

西北区西濒北部湾，北与廉江县（现廉江市）接壤，是高雷地区通往广西、越南的咽喉。民国时期，这里的人民除了西面靠海的一小部分为半渔半农之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均以业农为生。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地主豪绅的压迫盘剥，加上兵匪祸乱、天灾连年，致使这块干旱瘦瘠、靠天吃饭的土地上，经济凋零，灾祸不断，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穷则思变”；“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是社会变革的历史发展规律。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使沉睡了多年的西北区大地开始苏醒，使苦难深重的西北区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在广州参加中共的遂溪革命青年黄学增，返乡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在遂溪点燃了革命的火种。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遂溪建立基层党组织，以及国民革命军南讨军阀邓本殷、光复广东南路地区之后，遂溪的国民革命运动开始由秘密转上公开，并逐步推向高潮。是年间，涧水河畔同文村的革命青年邓成球（又名邓足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被派往国民党遂溪县第二区办理党务和从事农运等工作。自此，第二区（辖界炮、北潭、杨柑、北坡、草潭、下六、港门一带）的农民运动，在邓成球等人的领导下，开展得如火如荼。

1926年1月18日，邓成球在第二区界炮圩办理党务时，悬挂标语，张贴布告，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当时，适逢该区保卫团局长杨文川擅增市场税捐，肆意苛抽勒索，横行鱼肉乡里，普遍激起民怨，当农民群众看到邓成球所贴的标语布告之后，更加群情激愤，纷纷表示：“如能打倒杨文川这条毒蛇，我们尽数加入农会！”邓成球于是因势利导，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于数日间组织成立了几个乡级农民

协会，并定于2月4日①在界炮圩举行集会和示威巡行。2月4日，遂溪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派薛经辉、周纪抵界炮，协助邓成球组织集会巡行工作。当日，因参加集会的群众情绪十分激昂，组织者恐发生意外暴动，因而改名为“反对日本出兵满洲示威运动大巡行”。然而，由于民众对杨文川极为痛恨，巡行时不断大呼“捕毒蛇、打杨文川”，兼之当天保卫团局的联防队兵收税重次，民众更加怒不可遏，遂围拢上去教训队兵，继而冲进民团局，痛打杨文川。其时，附近的群众纷纷闻声而至，人数猛增至数千，妇孺亦以一击为快。事后，第二区的群众大受鼓舞，继涧水河北部的大塘、海田、枫树、同文、科港、老马、山塘、斗仑、东边、山猪窝等乡农会成立之后，南部的泉水等乡也相继成立了农会，不久又成立了第二区农民协会，并组织了农民自卫军，配备七九、六八、九响、村田、土制单响等枪支50余杆。同年4月，遂溪县农民协会成立，邓成球被选为县农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0月，邓成球与韩盈、黄广渊、钟竹筠（女，杨柑志忑塘村人）等12人组建了中共遂溪县委，为县委委员。在此前后，涧水河南北的各级农民协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一切权利归农会”为号召，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解放婢女等革命运动，同地主、土豪劣绅及一切封建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还参与了全县组织的“促成国民会议”、“援助北方革命军”、“拥护省港罢工”、“敦促广东国民政府提师北伐”等革命活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残酷镇压革命运动。为了反击国民党的野蛮大屠杀，中共遂溪县委和县农会于1927年4月24日在杨柑圩开会研究对策，突然遭到反动当局的包围袭击，邓成球、颜卓等10多人不幸被捕，5月21日与韩盈等14人一道被集体枪杀于遂溪城竹行岭。至此，涧水河南北地区以至全县各地的革命群众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其后，第二区的部分农民武装，参加了中共遂溪县委负责人黄广渊、陈光礼发动和领导的革命武装起义，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1928年9月，撤据斜阳岛的遂溪起义军回师内陆作战，在遂溪西北部沿海斗仑村一带登陆后，当地群众武装当即会合一起行动，于当天深夜袭击占领了遂溪县城，消灭了一批国民党反动武装，缴获枪支60多杆和大批弹药，并打开监狱，解救了200多名农会会员和群众。此举在当时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是，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军设在界炮、北潭、杨柑、乐民、河头一带沿海地区的联络站相继被破坏，斜阳岛根据地于1932年底被攻破，坚持了5年之久的革命武装斗争遭到了失败。

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艰苦卓绝的革命武装斗争遭到失败之后，革命的火种并没

有熄灭，一批受革命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相继外出求学，或组织秘密读书会，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寻找共产党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西北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青年抗敌同志会”等抗日团体，在广大农村大办民众夜校，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使中共地方党组织在西北区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43年春雷州半岛沦陷，国民党地方当局及驻军纷纷弃土北逃；共产党毅然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在西北区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武装，实行联防自卫，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并于1944年8月在老马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在广东南路地区率先打出了共产党独立自主武装抗日的旗帜，英勇抗击日、伪、顽军的频频围剿，将遂溪以至南路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迅速推向高潮。1945年2月，南路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在山家村成立，西北区敌后抗日根据地随之形成并不断巩固和发展，为遂溪及南路地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策划内战，调遣大量军队进驻遂溪，一方面劫收抗战胜利果实，一方面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人民武装进行疯狂围剿。中共遂溪西北区党组织贯彻执行上级关于“撤退、隐蔽”的指示，调整撤退干部，精简疏散武装，改变斗争策略，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1946年夏秋重新集结武装，恢复公开武装斗争，主动出击国民党反动派。1947年春开始，全区掀起了大搞武装斗争高潮，各级党组织、人民政权、革命武装普遍建立和迅猛发展。1948年春，部分指战员被编入主力部队，东、西挺进支援粤中和十万大山地区的革命斗争；继而重组人民武装，积极展开军事攻势和统战工作，于年底解放了本区的绝大部分地区。其后继续扩军，发展生产，积极筹粮，一方面抓好本区建设，另一方面竭尽人力、财力、物力支援外区和前线，直至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全面解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北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地经受了20多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就有700多人参加中国共产党，1900多人参加区乡脱产武装及县以上的主力部队，200多人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革命业绩，谱就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为遂溪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增添了光辉夺目的一页！

然而，由于历史资料和笔者编写水平所限，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区的革命斗争历史，本书只能在“引子”中略作交代；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历史，虽然分上、下两篇进行较为详细的记述，但仍有许多疏漏、粗糙、不当之处。因此，本书仅可作为一块引“玉”之“砖”，抛出后惟求得到知情者和专家学者

的充实斧琢，使之臻于完整可信，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作用。

①黄学增在 1926 年撰写的《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中记载为 2 月 5 日，但此日不是界炮圩期，故老同志建议改为“4 日”。

上 篇

抗日壁垒

一、建立党组织和两面政权 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北平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只有全国各民族团结抗战，中国才可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其时，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

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遂溪县的遂中、简易师范、七小及东海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组织起来，宣传抗日救国。当时，在七小教师的西北区进步知识青年何森(杨柑籍)，与进步青年支仁山、殷杰、招离等10多人一起，组织了抗日救国下乡宣传队，以七小(设于麻章)为立足点，自筹经费，到附近农村巡回演剧、演讲，向群众宣传抗日思想。8月，何森又与许乃超(1926加入中共的老党员)、邹延炳(北坡籍)等在七小组建了60多人的遂溪青年抗日宣传团，出版《救亡》、《怒吼》等抗日刊物。随后，他们还筹集资金，在遂溪城东门开设一间“南化书店”，大力推销进步书籍和抗日救国报刊。

在以国共合作为主要政治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国民党遂溪县政府于1938年4月成立了“抗日自卫团遂溪县统率委员会”，西北区的杨芹香、何茂生等人参加了这个组织。次月，统率委员会组织成立一个“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队”，巡回各乡，宣传抗日，并调查民枪，组织自卫队，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做准备。

1938年8月，在广州参加中共的遂溪革命青年黄其江、陈其辉二人，由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派遣，回遂溪重建中共地方组织和开展抗日活动。他们联系和发动社会各界进步青年，通过合法形式，公开成立“遂溪县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团结各阶层人士和群众，在全县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遂溪县“青抗会”成立后，即派出邓麟彰、莫怀等主要骨干到界炮镇，通过镇政府召集50多名青年开会，成立遂溪县

“青抗会”界炮分会，进步青年教师张鸿谋、马叔良、金子瑛、伍文等被选为分会负责人，统一领导界炮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

(二)大办民众夜校 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遂溪县“青抗会”成立初期，在中共遂溪党组织的领导下，总结前段抗日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把抗日救亡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大办民众夜校，广泛深入地宣传发动群众抗日。

根据这个决定，何森于1938年底到陈村找陈开濂商量，叫陈开濂立即返回西北区，以办民众夜校的方式，深入开展农村的抗日救亡工作。步骤和基本工作方法是：先从大村着手，造成影响，以大村带动小村；树立典型，搞全家革命，以一家带动全村，并使全村群众上下一条心；以一村推动邻村，逐步发展成一片，形成一片红。陈开濂回到西北区后，即到涧水河北部的部分村庄去，找村中一些有威信、有影响的人，如山家的李绍香，山内的李正杰，斗仑的周锡经、周维道父子，金围的张德昌，同文的邓成美，老马的马叔良、马如杰等人，一道商量兴办民众夜校的有关事宜。与此同时，遂溪县“青抗会”还派黄明德、黄槐、莫怀、支尧光、王玉引(即王宝华)、唐协森、黄克明、梁华栋、陈达人、马冠球、金子瑛、伍文、潘立中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深入到西北区举办民众夜校。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于1939年2月在西北区办起了第一批民众夜校，共有10间，具体分布是：山家新村、老村、东村各一间，负责人先后有黄明德、黄道修(黄轩)、黄克明、陈醒亚、曾锡驹、苏良、林飞雄；老马村一间，负责人先后有黄槐、马如杰；同文一间，负责人先后有王玉引、黄槐、陈荣典、梁华栋、李成伟；斗仑一间，负责人唐协森、陈元清、黄仪；安塘一间，负责人先后有支立臣、莫怀、黄克明；金围一间(1938年秋办起)，负责人先后是张鸿洲、张立明、张德昌、支尧光、黄轩、陈玉英(女)、罗培畴；北潭勇胜小学民校负责人陈开濂等；北潭坡民校负责人潘立中、伍文。这些民校的负责人，都是县青抗会的会员或骨干。

西北区第二批民众夜校开办于1939年下半年，共有15间。具体村庄和民校负责人如下：鵝湓山(梁华栋、梁志远)(括号内是民校负责人，下同)、南坪(莫振生)、横仓(陈达人)、甘定园(陆锦西、马冠球)、合沟(张鸿谋，后全其钦)、山口仔(全德珠、陈理祥)、赤坎仔(凌振兴)、龙塘(马叔良)、竹仔(梁志远，后林杰)、北艾(马冠球)、担水塘(马冠球、后梁志远)、中溪(何珍)、黄江尾(陈荣典、张德昌、郑贤培)、槟榔界(周杰生)、眼镜塘(陈拨、陈冬)。

西北区的民众夜校是在不断克服阻力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封建思想严重充斥的农村，从来不允许妇女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因而，在开办民校之初，一些妇女由于受封建思想的束缚，不敢大胆走出家门，参加夜校学习和其他活动；同时，一些顽固分子还暗中指使农村中的无赖，散布各种流言蜚语，妄图制造舆论阻力，阻止妇女上民校。此外，还有的公然破坏民校。如合沟村一些流氓分子，多次闯进夜校设在全承辉家的教室，赶走教师，驱散学员，恐吓屋主，强迫主人闭门迁校，否则放火烧屋，行为十分狂妄野蛮。面对这些阻力，民校老师并不气馁退缩，而是更加坚强地开展革命工作，一方面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设法解除某些人的思想顾虑；另一方面对那些造谣中伤和蓄意破坏分子进行警告或惩罚，逐步消除了各种阻力。为了解决经费方面的困难，民校老师组织群众进行各种集资活动。当时，老马村以党员为基础，组织一批青年积极分子，组成一支四五十人的开荒队，到长板塘村南开垦荒地 60 多亩，另外围海造田 70 多亩，种植番薯、黄粟、稻谷等农作物，收获较为可观，既可以解决民校教师的生活问题，又可以为民校的教学和其它活动提供经费，甚至还可以适当帮助一些困难户。金围民校初办时，粮、款、课室俱欠。该村进步青年于是组织起来下海捉鱼筹款，很快便建起了一间课室，使全村群众有了一个安定的学习场所；如果民校急需什么费用，掌管本村公偿的张立明即从公偿中提取列支。此外，山家、斗仑等村的民校，也都是靠全村群众的积极支持，集体筹款筹粮，才得以开办下去的。

各村的民众夜校办起来之后，村中的男女老少都积极参加民校组织的学习和各种活动。学习内容主要是：中国为什么会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什么要抗日救亡？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能兴起？等等。民校除了通过上课、教救亡歌曲、演剧等形式向群众灌输抗日救亡思想之外，还组织群众在老马、山家、金围等地进行游击战演习活动，从而使群众初步懂得一些基本军事知识，为今后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作准备。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活动，是在 1939 年 2 月中旬，西北区党组织负责人殷英等人以青抗会的名义，发动全区青抗会员、民校老师、群众和一部分进步绅士、开明地主共 2000 多人，在科港村后背岭举行一次攻防大演习。此外，各村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很活跃，如马如杰、叶大林、叶卓锋等人曾几次发动老马村群众集资聚餐，歃血盟誓，表示大家团结一致，全村一条心。约在 1939 年 10 月，正当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时，中共遂溪县党组织在合沟村祠堂召开了一次有五六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三大政治主张。与会人员大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抗日的

决心和信心。

当时，乡村民众夜校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原因之一是民校教师密切联系群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艰苦朴素，同农民群众建立深厚的阶级感情和鱼水关系；其二是宣传教育了群众，使群众懂得了许多革命思想和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其三是诚心诚意为群众服务，办了许多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好事和大事。当时农村在封建地主的盘剥下普遍破产，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又多如牛毛，群众负担很重，生活极端贫困，农民子弟普遍无钱上学，文盲者占总数的90%。民众夜校的开办，犹如旱天降甘露，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农民读书难的问题，同时民校老师还出面与地方政府交涉，千方百计为群众减少壮丁额和捐税，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对于民间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和纠纷，民校老师也常常主动出面帮助解决。在由封建势力统治的农村中，土豪劣绅横行乡里，武断民事，敲诈勒索，鱼肉人民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山家乡长李昌堂是个鸦片烟鬼，每逢乡中发生纠纷，群众要求他出面调解时，他便乘机敲诈，要群众送上烟土才肯出面调解。民校老师得知这种情况，便主动找有关群众商量，帮助群众消除误会，化解了纠纷。民校老师由于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实事，因而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深受群众的拥护和尊敬。由于这样，原由土豪劣绅统治的广大农村，便逐渐变成了民校老师说了算的天下了。

民校办起来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工作，普遍教育了群众，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出现了不少全家革命的可喜局面。如老马村的叶大茂一家，兄弟五人都参加了革命，其母亲吴大妈还有“革命母亲”之称；斗仑村周维道的几个子女都参加了党组织，等等。西北区人民在大办民校、发展青抗会员的同时，还普遍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如老马村成立了巡逻队、帮工队、农会、开荒队、妇女会、儿童团；山家村组织了农会、同心会、婶嫂会、理发会、儿童团；金围村组织了合作社、妇女会、儿童团、帮工队等。这些群众组织作用很大，各村的农会、帮工队、同心会可以直接组织群众搞生产，巡逻队可以保护群众的农作物，维护乡村治安；妇女会可以发动组织广大妇女摆脱封建桎梏的束缚，参与社会活动；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和送信，若发现坏人和可疑人进村，即向村内发出警号，因而可以保护党组织和干部的安全。当时，表现比较出色的儿童团团长有山家村的李炳聪和老马村的马四发。有一次，老马儿童团发现有三个国民党兵从枫树村走向老马村，便大声呼叫：“牛吃薯啦，快赶牛呀！”村内的群众听到警号后，立即把前来了解情况的中共遂溪县委领导人支仁山、邓麟彰掩蔽起来，保护了支、邓二人的安全。西北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当

时遂溪县开展得比较早的一个重点地区，全区人民都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并从中受到了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教育和锻炼，为后来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和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厚的群众基础。

(三) 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

中共遂溪县西北区党组织，是在抗战初期全县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不但建立得比较早，而且发展速度也是全县最快的地区之一。

1939年元旦，中共遂溪县中心支部成立后，作出了“面向农村，发展农民党员”的建党工作方针，要求在全县农村铺开办民校的同时，注意物色对象，培养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和发展农村党组织。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县中心支部委员殷英、邓麟彰和党员黄明德、莫怀、何森、王玉引、支秋玲、马叔良、支尧光、罗培畴等人先后来到西北区，一方面以办民校的形式，宣传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在工作中物色对象，发展党员，建立农村支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西北区的党员迅速增加，至1939年5月，全区的党员人数发展到120多名，除10余名是县党组织派来的外地党员之外，其余的都是本区的党员，其中涧水河北部地区约占100名，涧水河南部地区占10余名，全区的中共党员人数约占当时全县的二分之一。

西北区农村党支部(或小组)成立得比较早(1939年春以后)的有如下10个：山家新村支部，支书李华安；山家东村支部，支书李华明；山家老村支部，支书李绍香，以上3个支部共有党员42人；老马下村支部，支书叶卓锋，党员14人；同文支部，支书王玉引，党员7人；斗仑支部，支书周锡典，党员7人；金围支部，支书张立明(后张鸿彪)，党员30多名，其中女党员11人；北潭坡支部，支书伍文，党员3人；山内支部，支书李鸿基，党员6人；山党小组，组长符世芳。至1939年10月，中共遂溪中心县委成立，接着成立了东、中、西3个区委会。其中西区区委书记殷英，区委委员有黄明德、王玉引，负责管辖遂溪县西部、西北部地区的党组织。

这些党支部建立后，很注重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建设，努力使党支部成为领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战斗核心。1939年11—12月间，遂溪中心县委委员支仁山、唐才猷在老马村举办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党训班，西北区各支部书记均参加了培训学习。翌年春，中共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又在老马村主持举办了二期党训班，其中一期是日班，一期是夜班。在此期间，莫怀、唐多慧等还分别在金围、铺后等地举办党员学习班。这些党训班和学习班，主要是培训干部党员及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党性、党纪教育，在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时，还根据形势的需要，以方志敏、黄学增等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对党员进行革命形势和革命气节教育。

西北区是抗战初期中共在遂溪重建发展农村党组织的重点地区之一。该区党组织的特点是：（一）群众基础好。党组织在成立和发展初期，通过办民校的形式，深入农村，与广大农民建立了鱼水相依的血肉联系，因而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二）党员思想素质好。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党组织从大批积极分子中严格挑选发展对象，并在工作中加以认真考察和培养，直到条件成熟才吸收入党组织。（三）党员具有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党组织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教育，不断通过办党训班等形式，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革命形势、革命气节教育，因而无论形势如何恶劣，广大党员都能表现出坚贞不渝的革命意志。

（四）两面政权的建立及其作用

30年代末的国民党遂溪县基层政权，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及制度上的不完善和混乱，贪污腐化成风，引起群众的普遍不满，各种政令的实施越来越困难。国民党遂溪县政府为了缓解民怨，不得不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以求加强基层政权机构，巩固其统治。为此，国民党遂溪县当局于1939年8月在麻章举办了一期“乡政人员训练班”（简称“乡训班”）。

其时，中共遂溪县党组织决定抓住这有利时机，设法控制部分乡镇政权，为下一步开展农村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于是报请上级同意，选派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乡训班”。其中，从西北区选派去的有陈开濂、何森、潘立中、张鸿谋、梁乔栋、张鸿洲、李炳连等人。他们在“乡训班”学习结束后，经过激烈的说理斗争，并通过社会舆论压力，促使国民党遂溪县政府给予安排工作。是年10月，以上从西北区选派去的乡训班学员，大多被安排回本区的基层政权机构工作，有的还担任了重要职务。其中：陈开濂任界炮镇镇长，张鸿谋任副镇长兼自卫中队长，潘立中任镇公所文书，梁乔栋、张鸿洲、李炳连分别被安排到杨柑、豆坡、山家等乡工作。

党组织掌握了界炮镇公所政权之后，接着便对下属29个保的保长进行审查和大调整，思想进步并有群众威信的继续任用，否则给予撤换，另选有威信、真心为群众服务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充任。经过调整之后，各保的保长如下：第一保（界炮圩）保长何永亨，第二保（界炮村）保长郑选贤，第三保（深沟一带）保长郑德纯，南坑保保长余秉桃，大岭坑、坦塘仔保保长施永猷，大基头保副保长李文海，黄江尾保保长黄焕昌，山内保保长李琼伦，大湾塘保保长王永俊，老马保保长马巨贞（后马如杰），同文保保长邓成连（后

邓成美)，金围保保长张德泰(后张立明)，山塘保保长杨晋安，斗仑保保长周延焕，安塘保保长杨晋祥，北潭保保长张世金，合沟保保长邓家材，洋高保保长吴承华(吴玉光)，流坵保保长陈忠家，南昌保保长黄明勋，洞口保保长谭其本，上龙保保长杨晋茂(后杨廷贤)，科港保保长邓如仁，枫树保保长周芝璜，长板塘保保长马利明，大山口保保长全德珠之父，龙塘、大塘保保长邓士钊(后邓成景)，涧水保保长郑锦标，江头村保保长赵××，卢屋、云上、后角保保长罗××等。在以上 29 个保长中，除上龙保保长杨晋茂、涧水保保长郑锦标反动而后来被撤换和镇压之外，马如杰、张立明、李琼伦、邓成美、邓成景等 5 人当时已是共产党员，其余的均是进步群众，并且有大部分在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因此，这些保政权表面上虽然是属国民党的，但实际上已为共产党所掌握。

上述两面政权建立之后，公开挂的是国民党的招牌，实际做的是共产党的工作。他们本着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宗旨，诚心为群众办事，所履行的任务主要是：(一)维持社会治安，调解民间纠纷，禁烟禁赌。当时，国民党当局虽然也禁止赌博和抽大烟，但只贴布告而不行动，任由这种恶劣现象泛滥，致使许多赌徒烟鬼走上盗贼之路，四处偷鸡摸狗，盗财窃物，加上一些地主土豪大肆投机倒把，疯狂走私资敌，群众受害殊深。镇公所针对这种情况，捉拿起一批赌头烟鬼，进行拘监惩罚，并打击了走私集团，有效地整顿了社会秩序，受到广大群众的称赞。(二)保护党组织的安全，并利用公开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秘密收集有关情报，配合党组织办好民众夜校，搞好群众工作。(三)积极为群众减轻各种不合理负担。当时，对国民党的“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政策是不能公开反对的，否则会被国民党当局抓住把柄，指责这些基层政权破坏抗日和统一战线。因此，县党组织采取巧妙的对付办法，部署各乡镇统一行动，一致采取拖、减、欠的办法，尽量使群众少出丁、粮，并免除了除市面捐外的其他各种苛捐杂税。

二、执行“十六字”方针 积极发展新地区

(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来临与党组织采取的对策

正当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的时候，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抗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于 1939 年初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并在是年冬至次年春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严重地波及到广东南路、遂溪以至西北区。其时，国民党遂溪县当局对“青抗会”的活动严加限制，并以《青

年阵地》(“青抗会”机关刊物)有异党言论为由,下令禁止出版,继而强令解散“青抗会”。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反共反人民高潮。国民党遂溪县当局积极执行反动政策,通缉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反共反人民的气焰极其嚣张。

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两次反共高潮期间,中共遂溪县党组织及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1939年9月下旬,西北区的部分共产党员、青抗会员和民校教师,前往中区其连山西田村参加中共遂溪县工委组织的抗日自卫武装动员大会,公开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主张,呼吁国民党当局团结抗日。次年4月,又在东区黄略村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反汪”大会,声讨汪精卫投降日本,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议国民党遂溪县政府强令解散“青抗会”,压制抗日救亡运动。接着,西北区党组织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按照中共遂溪县委的部署,积极做好“隐蔽、巩固”工作。具体措施是:(一)改变活动方式和工作作风,停止一切容易引起党组织暴露的政治口号和活动。党员要以社会化职业和群众化身份出现,开展“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二)政治上暴露和已被国民党怀疑的共产党员及进步群众,要安排撤退外地,伺机发展新地区;不须撤退的党员、干部,则留在原地区坚持地下斗争。(三)在老马村举办党员训练班,对党员进行阶级教育、形势教育、党性党纪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四)开展审查党员工作,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

(二)调整干部 发展新地区

为了保护党员干部和党组织,西北区党组织遵照中共遂溪县委的指示,进一步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十六字”方针,大量调整干部,把所有暴露身份的党员和进步群众转移到外地。这时,全区党员干部的调整情况如下:殷英、陈开濂、张鸿谋等人撤退到东海岛,以教书职业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李绍香、李炳发、李毓淮、李华安等人撤退到广州湾,从事打坭砖、做短工、摆小摊;何森撤退到港门,以教师身份隐蔽下来;梁志远、梁乔栋二人则打入国民党遂溪县府的政工队;梁华栋到东区文车乡公所当干事,后转到仲伙乡中心学校教书;张立明撤到赤坎。留在本区坚持斗争的人员主要有:全子瑛任界炮乡长(1942年改任镇长);马如杰留在老马继续任保长,除负责老马村的工作之外,还负责与撤退到外地的人员保持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尚未暴露的干部留在本地区坚持

斗争，如何珍在豆坡、中溪一带以教书为名开展工作；李直光在杨柑中学读书，秘密开展工作；梁甫在山家村当长工，坚持掩蔽斗争。在此期间，中共遂溪县委从县内其他地区安排了一批党员和干部撤退到西北区，他们是沈汉英、张世聪、陈希古、林杰、李仕扬(又称王先生，绰号突牙王)、黄明、王乔英、支秋玲、梅先生等。

在国民党顽固派相继掀起两次反共高潮的严峻形势下，西北区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十六字”方针，及时采取撤退隐蔽的措施，以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从表面上看，这时的革命斗争似是转入了低潮，其实，这只是斗争形式的改变，即从大张旗鼓的公开化转为分散、隐蔽式。这些党员和干部，紧紧依靠大办民夜时普遍建立起来的坚实群众基础，克服种种困难，战胜反动顽固势力的白色恐怖，积极地秘密开展工作，既巩固发展了党的组织，开辟了大片新地区，又为后来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

三、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雷州半岛沦陷后西北区的局势

1943年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切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和掠夺物资支援太平洋战争，于2月中旬派遣混成第二十三旅团3000多兵力侵占了雷州半岛和广州湾。接着，日军在雷州半岛先后组织起2000多人的伪军，并建立伪政权，对雷湾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是年4-5月间，日伪军开始进驻西北区各重要圩镇，其中：豆坡有100多日军，北坡有30多名日兵，杨柑先后有伪军大队(大队长林益三)20多人和伪军自警团(团长周之墀)约30人，乌塘有伪军自警团(团长梁朝福，后林邦瑶)20多人。

在日军侵占雷州半岛时，当地国民党防军和反动地方武装一枪不发，闻风而逃，遂溪、海康等县的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携眷北逃廉江、化县等地，致使日军在雷湾登陆后如入无人之境，几天之内便控制了雷湾的主要城镇。其时，一些民族败类，投靠日军，充当汉奸，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些国民党基层乡政人员及土匪流氓，则乘人心恐慌、社会混乱之机，大发国难财。如豆坡乡长郑从贤勾结河图仔村反动武装，抢走豆坡当铺大粮仓的粮食；外号叫“亚丁”的等股匪，肆无忌惮地在白天抢村劫物；而日伪军则更是疯狂地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在日伪军的烧杀淫掠和土匪兵痞的祸害下，

广大人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抗击日军的侵略，保卫国土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中共遂溪党组织根据中共南路特委的指示，毅然肩负起武装抗日的历史重任，部署各区乡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以“联防自卫，保卫家乡”为口号，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西北区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把领导全区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一方面通知撤退外地的党员、干部返回本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一方面以党支部、党小组为基础，组织敌后抗日游击小组，同时以原来举办民校的村庄为主要阵地，广泛发动群众，筹款购置枪械，或通过其他各种渠道筹集枪支弹药，组织村队、自卫队、巡夜队等抗日武装。

（二）组织民众 联防自卫

1. 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

西北区的人民抗日武装，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人出人”为号召，而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43年2月遂溪沦陷后，中共西北区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立即着手组建武装，准备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最初，张鸿谋、张鸿洲、张立明等人到西岭村，利用同姓关系向前界炮乡长张德安及其弟张德星等商船老板借枪，从而充实扩大金围保（包括西岭、南坪二村）队武装，结果借得七九步枪4支、九响步枪3支、六八步枪3支。这样，金围保队便共有15支步枪（原有5支）和9支手枪了。接着，党组织又通过界炮乡乡长全子瑛（中共党员），以乡公所的名义在界炮圩召集界炮一带的进步青壮年开会，组建了界炮乡抗日自卫队，由陈炳崧（曾参加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任队长。几天后，陈开濂、马朝伟等也组织了10多人枪，并拉到金围小学，与金围保队会合。在此期间，西北区党组织与中区党组织联系，从中区西田附近岭头的国民党军弹药库“借”回数百箱手榴弹。

通过以上途径筹集到的枪支弹药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的武器则是靠动员群众普遍筹集。西北区人民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筹枪抗日的积极性很高，他们不惜卖掉田地、渔船、耕牛、树木、粮食、家禽、牲畜等，用换得的钱来购买枪支。如赤坎仔村有一户农民，为了筹枪抗日，不惜将一家三代赖以生存的一块地卖掉，将换来的钱买回一支枪。村中的群众很受感动，纷纷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理由很简单，家中出了个‘打仔’（即抗日游击队员），他连性命都不顾，我还能吝嗇这几千元吗？”家中一贫如洗、无物可以换钱的群众，则通过亲戚朋友帮助，四出借款买枪。有的村庄

筹集到款后，在本地买不到枪，便派人到灵山等地购买。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全区很快便筹集到 400 多支长短枪和 5000 多颗子弹、数百箱手榴弹。以下是部分村庄新购置长、短枪支的情况：山家 40 支(包括原有的共 81 支)；金围 38 支；山内 25 支，子弹 2000 多颗，手榴弹 6 箱；老马 31 支，其中马成德一家 5 支；曲水泊 30 多支；中溪村(仅 10 多户)3 支七九步枪；斗仑村 5 支步枪。

在筹集枪支弹药的同时，党组织通过两面政权的密切配合，以公开合法的形式(挂国民党的招牌)，在各乡、村迅速组织起村队、游击小组、巡警队、自卫队、联防队、常备队等抗日武装。涧水河北部地区的抗日武装发展得比较快。1943 年夏，李鸿基受党组织委派，回山内村组织了一支 10 多人的抗日游击小组。不久，在中共雷州特派员陈恩和遂溪县委负责人支仁山、唐才猷、沈汉英等人的领导下，山家、山内一带组织了一支 200 多人的联保队。在此期间，马如杰、马德光等人以老马村巡警队为基础，成立了一支近 40 人的联防队；张立明等人在金围以原保队为基础，组织了 30 多人的联防队；周锡典等人在斗仑组织了一支 20 多人的联防队；担水塘村也组织了 20 多人的联防队。

在涧水河南部地区，何珍、李直光等人集中民间枪支，组织一支 10 多人的巡逻队，负责维持豆坡一带的治安秩序。这个巡逻队，设法借了一些地主的谷和豆坡粮仓里的田赋谷，赈济群众。时值饥荒，群众得到赈济，极为感动，因而豆坡一带的群众很快便发动了起来，并在何珍、李直光等人的组织下，轰走豆坡伪乡长，另成立豆山乡(豆坡、山家合并，乡政府设在山家)，推选支持抗日的开明人士何宗琦出任乡长，钟羨余任副乡长。接着，党组织便主动协助何、钟，以豆山乡政府的名义，组织一支武装巡夜队。此后，豆坡、山家一带的土匪、汉奸活动大为收敛，农民群众更加拥护共产党。在这有利形势下，党组织因势利导，随即发动中溪村、布政塘、新村、月弓村、青水、九有、松树园、西基、北山坎、铺后、豆坡等 10 多条村庄，成立抗日游击小组，共有 100 多人，20 多支枪；还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是年 4-5 月间，党小组成员肖光章、肖平章等以龙湾仔、后田村的游击小组为基础，加上龙湾仔等村功夫馆的人员，组织起一支 100 多人、30 多支枪的抗日武装。1943 年 8 月，豆(坡)山(家)乡抗日自卫队成立，共 15 人枪，队长钟羨余，事务长何珍。同月，山内党支部根据遂溪县委的指示，在联保队的基础上，以南区转移来山内的敌后抗日游击小分队为骨干，成立山内常备队。全队 30 多人枪，由山内党支部统一指挥，共产党员郑世英、李仁廉、陈慎辉分别任队长、副队长、指导员，李恒生、李康绪、洪剑芳、黄瑛等为常备队的骨干。

1944 年春，山家一带的村庄实行联防自卫，动员 18 岁以上的青壮年男人参加联防

队，并从中挑选 30-40 人成立常备中队，中队长李绍香，事务长洪德(兼常备中队党支部书记)。次年春，北潭、北潭坡、甘定园一带也组织了联防区和联防队，并成立一支 25 人的常备中队，中队长全德秋。

总之，在遂溪沦陷后，西北区人民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普遍做到“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大力组织抗日武装。至 1944 年夏，全区已拥有 2000 人以上的脱产、半脱产和不脱产的抗日武装力量，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2. 联防自卫 英勇打击日伪军

西北区人民抗日武装建立起来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铲除汉奸和打击日伪军的斗争。1943 年春，日军侵占遂溪后，西北区枫树村流氓头子周之墀即投靠日军，被任命为杨柑自警团团长，其小老婆陈惠珍(绰号“黑肉鸡”)为副团长。他们夫妇二人狼狈为奸，经常带领三四十人的武装，四出抢掠，无恶不作，对人民抗日武装和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较大威胁。西北区党组织早就想除掉这股伪军。1943 年农历 9 月 22 日，老马村党组织获悉周之墀潜回赤坎仔村饮喜酒的情报。马如杰当即派叶爱、马康胜、叶大林、马康贵、马如琼、叶高、马朝萃等人，乔装成买猪的村民，前往赤坎仔村，乘周之墀酒后抽大烟之机，冲进房去对其发动突然袭击。周之墀身粗体壮，加上未被击中要害，负伤后拼命逃出村外。游击队紧追不放，最后将他击毙于村边。

1944 年 1 月 20 日，驻洋青日伪军约 100 余人(内有骑兵)，绕道进犯西北区。当这股敌人窜抵龙头窟、山内河附近时，即遭到山内抗日常备队的狙击，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至上午 9 时左右，陈炳崧带领界炮乡自卫中队驻界炮小队赶来增援，从侧面打击敌人。敌人在抗日游击队的左右夹击下，不支而退。在这次战斗中，小队副叶爱(中共党员)英勇牺牲，另有几名队员负伤。战斗结束后，党组织在界炮圩主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发动西北区 10 多个正副乡保长抬柩送灵，并组织上万群众参加公祭。这次追悼会，场面盛大，气氛悲壮，参加公祭的群众个个义愤填膺，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同月，在遂溪南区卜巢山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黄其炜中队，因日伪军纠集优势兵力对卜巢山进行疯狂围剿，而被迫分两路撤离卜巢山，其中一路由中队长黄其炜带领转移到西北区，加入山内常备队。因此，西北区人民抗日武装的战斗力的战斗力得到了明显增强。

1944 年 2 月 1 日(农历正月初 8 日)，西北区党组织获悉“黑肉鸡”在其丈夫周之墀死后接任自警团团长，反动气焰极端嚣张，扬言要铲平老马村，为其丈夫报仇，并于最近率部窜到杨柑圩附近的马城、新埠、蒙塘、老河一带抢劫，掠走大批财物，目前龟缩在东边田村据点的情况。西北区党组织认为必须尽快消灭“黑肉鸡”这股伪军，于是召

开紧急会议，一面研究歼敌方案，一面派人分头通知山家、老马、赤坎仔、竹子山、金围、斗仑等村的游击队到老马村集中，杨柑、豆坡一带的游击队赶到后田村集中，待命出击。当晚三更时分，涧水河南、北两片的抗日游击队会集于后田村，由张世聪(1940年合浦白石水武装起义领导人)作战斗动员和进行统一编队，宣布界炮片游击队 120 多人为一个中队，由马德光任中队长，杨柑片游击队 80 多人为一个中队，由肖光章任中队长，各中队均分为 3 个小队，整个战斗由黄其炜负责全面指挥。次日凌晨 2 时许，游击队从后田村直插东边田，当到达东边田村附近时，即分路突袭敌人。但是，由于负责从西、北两面包围袭击敌人的游击队过早暴露了目标，敌人发现后从西面丛林逃出村去。这时，“黑肉鸡”乔装成农妇，急忙往白水塘村方向逃去。马如杰立即派叶大林、马如琼、马顺元等人前往追赶，在白水塘村内捉住了“黑肉鸡”。与此同时，其他游击队员分路追赶散逃之敌，捉获陈永汉等 10 余名伪军，缴获了 10 多支长短枪。

东边田战斗结束后，游击队拉队回杨柑圩，审讯“黑肉鸡”等俘虏。“黑肉鸡”十分狡猾，她假意招供，表示愿将“功”赎罪，提供了假情报，说其所有武器弹药全部藏在东边田村附近。游击队不知其中有诈，于是派出两个小队共 50 多人，由张世聪、黄其炜带领，于当天下午 2 时左右开往东边田寻找武器。当游击队到达白水塘村西面的一口大山塘附近时，却与一队日军遭遇，双方当即展开激战。由于日军埋伏在松林里，占领了有利地形，加上装备优良，火力十分凶猛，致使不少游击队员相继牺牲和负伤，因而只好且战且退，撤回杨柑圩。在这次战斗中，中队长黄其炜等 14 位游击队员牺牲(其中 3 人是负伤后被捕杀害)，张世聪等人负伤。

白水塘之战后，游击队押着“黑肉鸡”等伪军俘虏，转移到老马村，召开群众大会公审“黑肉鸡”，然后将她处决。同时，党组织为了做好善后工作，进一步激励群众抗日，一方面布置党员分头安慰烈士亲属，派人到白水塘战场运回烈士的尸体；一方面与中区和廉江等地的党组织联系，准备组织慰问团；此外还召集附近各村父老，商量举行追悼会事宜。在举行追悼会那天，廉江县毗邻地区和遂溪县城月、洋青等地党组织，纷纷组织慰问团前来参加，会后逐村逐户慰问烈士亲属。烈属们十分感动，广大群众亦深受激励，都表示要继承烈士遗志，抗战到底！此后，西北区人民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再次掀起了筹枪热潮，进一步发展武装力量，为下一步的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白水塘战斗后不久，国民党北坡乡长秦荣升和杨起德一道逃到界炮。西北区党组织执行团结抗日的政策，主动同秦、杨二人商量抗日事宜，决定界炮、豆山、杨柑、北坡四乡(同属遂溪二区)实行联防抗日，由秦荣升任联防区主任，陈炳崧为副主任。同时成

立一支 90 多人枪的联防中队，由杨起德任中队长，下辖 3 个小队，分别由共产党员李锦章、莫振生、马康胜担任小队长。在此期间，何珍、林德、李方远等带领豆山乡抗日自卫队几次袭扰驻豆坡圩伪军，并杀掉 10 名汉奸，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三) 以老马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 掀起抗日武装斗争高潮

1. 老马抗日武装起义

1944 年春，中共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前往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王若飞、林伯渠、张明等人详细汇报了南路的情况。南方局根据日军将要打通湘桂线，南路很快就会变成敌后的实际情况，指示南路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尤其要开展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王若飞强调指出：“与当地国民党区乡政权建立联防队，这种联合抗日的武装斗争有时是起到作用的。但单靠这种形式是不够的，而且有被他们吃掉的危险。因此，必须搞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你们遂溪的老马村有几十个党员，有马如杰等坚强骨干，为什么不搞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呢？我们党有了自己的武装，一可以自卫，二可以自主地打击敌人，群众才拥护我们，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根据地。”

1944 年 7 月，南路特委书记周楠从重庆回到广州湾（今湛江市）之后，即召开特委会议，传达南方局的指示。会议分析了南路的斗争形势，针对过去过分追求合法形式，各地大多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抗日武装的弊端，并根据湘桂线战事日趋紧张的形势变化，决定加紧扩大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首先在遂溪沦陷区以老马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队伍，发展敌后武装斗争。会后，周楠和中共雷州特派员陈恩深入到西北区老马村，召集负责遂溪县和西北区一带工作的支仁山、唐才猷、马如杰、陈兆荣等人开会，传达董必武、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的指示和南路特委的决定，提出当前南路工作的方针和雷州半岛敌后斗争的紧急任务，强调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武装队伍，砸掉国民党的招牌，摆脱国民党的控制，首先在遂溪西北区搞起一个武装大队，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最后，他还对举行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大队等问题作了指示。会后，陈恩和支仁山、唐才猷等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和南路特委的决定，部署大家立即加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一是继续筹集枪支弹药，扩大和充实各游击小组、自卫队、联防队的武器装备；二是派一些骨干人员到界炮、山家、豆坡等联防队去，设法掌握这些武装和加强对这些武装的领导，待机率队参加武装起义；三是积极筹粮筹款和准备好其他各种军用物资。

经过约一个月紧张的准备工作，武装起义的条件已臻成熟。1944年8月8日深夜，抗日游击队首先把界炮联防队中张德安的手下全部缴械，然后开到老马村。与此同时，山家、豆坡的联防队也采取上述做法，把队伍开到老马集中。9日(农历6月21日)早上，老马、山家、后田、乾留、龙湾仔、同文、斗仑、金围、山内等村的游击小组，以及中区信和乡常备队和深坵塘自卫队的部分队员，举着义旗刀枪，会集于老马村祠堂门前，进行武装编队。其中：老马、竹仔山、同文、金围、斗仑等村的游击小组和原界炮联防队编为第一中队，山家、豆坡、后田、龙湾仔等村的游击小组和原山家、豆坡的联防队编为第二中队，山内村游击小组和深坵塘一带的部分常备队、自卫队人员编为第三中队，三个中队合编为一个大队，共200多人。

上午10时左右，武装起义大会开幕。支仁山代表中共南路特委宣布“遂溪县人民抗日联防大队”正式成立，并宣读了委任令：由马如杰任大队长(后唐才猷)，陈兆荣任大队政委，林杰任大队参谋；陈开濂任联防区主任，陈炳崧任副主任。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洪荣，指导员陈慎辉；第二中队长郑世英，指导员李绍香；第三中队长李鸿基，指导员李晓农。接着，支仁山在大会上向大家分析了雷州地区的敌我形势，并以深坵塘人民抗击日伪军的英勇事迹，鼓舞人们的斗志，激励全体指战员坚定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同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反人民的丑恶面目，指出只有组织起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武装队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战胜敌人，保家卫国。接着，由陈兆荣宣布起义大队的性质、纪律及其所肩负的艰巨历史任务。最后，大会还举行了起义宣誓仪式。

这次武装起义，是遂溪人民的一件大事，是中共南路党组织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正式开始，它标志着雷州半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转上了新的阶段，有力地把雷州半岛以至南路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推向高潮。

在以老马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后，遂溪县各地闻风响应，相继以游击小组为基础，集结小股武装，成立武装中队或大队，抗日武装力量迅猛发展。其时，西北区党组织负责人陈章在山内下村集结武装，于9月间成立一支抗日独立中队，中队长张鸿谋，副中队长李康绪，指导员李琼伦(后改任小队长)，事务长李恒生(后任指导员)。同月，肖光章等人集结后田、龙湾仔村一带的游击小组，成立一个中队，中队长陈永哉，指导员肖光章，教官郑世英。10月，何珍在杨柑、豆坡、山家一带组织一个中队，中队长李亚秋，指导员何珍，事务长李毓淮。11月，中共雷州特派员陈恩集中遂溪西区、西北区、中区、南区的抗日武装共200多人，在金围村整编成立“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大队”，大

队长洪荣，政委王平，副大队长郑世英。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政工队：第一中队长黄昌侯，指导员李树德，副中队长马成彬；第二中队长李炳发，指导员陈希古，副中队长陈益光；第三中队长李康绪，指导员沈潜，副中队长梁汝钦；政工队长廖华。同月，老马起义时成立的“遂溪县人民抗日联防大队”在吾良整编为“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后，余下的武装人员由唐才猷、黄其江率领抵达杨柑，并与东区抗日武装合编为“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12月，何珍又在豆坡一带组织了20多人的武装，后与陈永哉中队合并，共约60人枪。这些抗日武装的相继建立和迅速发展，为大力开展雷州半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以至南路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打下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2. 粉碎日、伪、顽军的围剿 大力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老马武装起义后，敌人大为震惊，相继调集优势兵力，妄图把新诞生的人民武装力量扼杀于摇篮之中。1944年8月13日，国民党雷州独立挺进支队和遂溪县反动武装共400多人，疯狂围剿老马和其他参加起义的村庄。遂溪县人民抗日联防大队在唐才猷、支仁山、马如杰、陈兆荣等人的指挥下，除了留下少数队伍驻守老马村之外，其余以中队为单位分散在老马村的外围，随时迎击敌人。当戴朝恩带领的挺进队和遂溪县长黄兆昌带领的县属反动武装到达老马村东面的江头村时，即遭到抗日联防大队的猛烈打击。顽军虽经多次进攻，但始终无法突过防线，只得败退而去。顽军第一次围剿受挫后，不甘心失败，戴朝恩、黄兆昌进一步纠集张德安、杨起德、梁传楷等反动武装共700余人，于8月18日兵分南、北两路，再次围剿老马一带。面对顽军优势兵力的疯狂进攻，抗日联防大队沉着应战，由第一中队阻击界炮方面的黄兆昌部，第二中队阻击豆坡方面的反动武装，第三中队则涉过涧水河，再折向牛牯围，从背后打击杨起德部。战斗打响后，杨起德部在第三中队的包抄袭击下，一时措手不及，慌忙溃退。从北路进犯的顽军由于失去照应，只好溃退而去。顽军第二次围剿失败后，更加老羞成怒，9月7日，戴朝恩、黄兆昌又纠集雷州挺进队及县反动武装等1000多人，直逼西北区。与此同时，驻下担的杨起德部和驻界炮圩的张德安部亦倾巢出动配合。顽军自恃人多势众，装备优良，从东、南、北三面进攻老马一带，妄图将人民抗日武装逼向西面的北部湾海岸，进而聚而歼之。然而，顽军万万没有料到，当其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地向老马一带进犯时，抗日联防大队只留下一个中队，并在各村队的配合下利用夜色与其周旋，其余两个中队则突出包围圈去，分头袭击杨起德的老巢下担和黄兆昌的大本营界炮圩。〔JP2〕顽军恐老窝被端掉，急忙连夜撤兵回营，退守据点，顽军的第三次围剿再次以失败告〔JP〕终。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武装的三次围剿之后，中共南路特委分析当前的斗争形势，估

计国民党反动武装很可能会第四次围剿西北区老马一带，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不利态势下，抗日起义部队如果久留老马一带，一方面回旋余地较小和影响队伍的发展，并有可能被吃掉的危险；另一方面还会招致反动武装的不断围剿扫荡，给当地群众造成更多的损失。因此，南路特委指示起义部队迅速撤出暴动区，向西南地区挺进，以保存力量，扩大队伍。根据上级这一指示，支仁山、唐才猷等率领起义部队向南撤出暴动区，转移到杨柑的乾留、龙湾仔和乌塘一带活动。南撤途中，起义部队按南路特委的指示改番号为“雷州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由唐才猷任大队长。9月中旬，该大队相继转移到中区的中伙、城里、调丰一带，9月20日转入卜巢山扎营整训，一星期后又拔营南进，于10月1日抵达乐民、河头、吾良一带活动。由于起义部队沿途宣传，积极扩军，队伍迅速发展到了300多人枪。这时，南路特委作出扩大和集结遂溪部队，南北挺进开辟新地区的部署，在吾良整编部队，把其中200多人整编为“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由支仁山任大队长，唐多慧任政委，继续向南部海徐地区挺进。整编后余下的100多人则由黄其江、唐才猷率领，留在遂溪西南地区活动，不久又转回西北区，迅速发展成为两个大队。

在抗日起义部队主力撤出暴动区南下之后，日、伪、顽军先后多次扫荡西北区，致使革命村庄和广大群众受到严重的摧残。其中：老马村民房被烧毁80%；山家村民房被烧毁96间，被掠走耕牛160多头；中溪村被烧毁民房24间；斗仑、金围、北潭、龙塘、同文等村民房被烧毁60多间，被掠走耕牛150多头及其它财物一大批；山内村先后被抓去6名群众，烧毁民房20多间，群众财物普遍遭洗劫，炊具、水井被撒满粪便等污物。在此期间，留在西北区的抗日武装积极备战，同进犯的日、伪、顽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伺机主动进攻敌人。1944年9月，豆坡抗日游击小组配合驻荔枝山村的洪荣中队，夜袭湛川祠堂敌据点，全俘伪军大队长林邦瑶以下官兵20多人，缴获长短枪20多支及弹药物资一批。同月，张鸿谋独立中队开赴中区螺岗岭一带缉私，缉获关金券400多万元、大烟土20多两，后又在西北区沿海截获一艘走私商船，缴获关金券300多万元、大烟土40多两。这些财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抗日起义武装的活动经费。同年11月，张鸿谋独立中队和陈希古中队合编后，旋即开赴遂廉公路，伺机伏击过往之敌，并惩办了洋青伪乡长宋成儒。12月中旬某日晨，90多名伪军从界炮圩出动，分路扫荡西北区沿海的斗仑、同文一带村庄。当敌人窜进联防区时，顿时螺角齐鸣，陈章和陈永哉、何珍带领的抗日中队，与李超儒、袁荣英、周锡典等带领的同文、科港、老马、斗仑等村抗日联防中队，利用有利地形抗击敌人，激战竟日，终于击退了敌人。这

次战斗，毙伤伪军 10 多人，俘敌 4 名；抗日联防中队牺牲数人。在此期间，西北区的抗日联防武装还先后围攻了曲水泊、沙古塘一带的卜建中、何寿章等反动武装，缴获长短枪数十支。后来，卜、何等反动分子逃走他乡。

(四) 成立抗日民主政权 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1. 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和活动

老马抗日武装起义后，人民抗日武装迅猛发展，尤其是主力南北挺进之后，雷州半岛敌后抗日武装斗争迅速进入高潮，而廉江、吴川、化县等地的抗日斗争形势也得到有力的推动。1945 年 1 月，中共南路特委组织和领导了廉、化、吴、梅边抗日武装起义，并与国民党爱国将领张炎率领的起义部队协同作战，全南路的抗日武装斗争形势进一步发展。其时，南路各县的抗日主力部队统一编为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辖两个支队，约 3000 人，其中第一支队基本上由遂溪的抗日主力部队组成。在这大好形势下，中共遂溪党组织根据南路特委的指示，以及西北区与廉江接壤，幅员较广，人民穷苦，群众基础好，而敌人对该区的统治势力比较薄弱，极利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决定在西北区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以便为抗日武装部队提供回旋余地和休整环境，并可以支援附近地区的抗日斗争。1945 年 2 月，根据中共南路特委的指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支队政治处主任黄其江前来山家新村，同西北区区委书记陈章(陈玉章)研究成立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有关事宜，接着又召集全德珠、郑南(郑锡康)、陈理祥等骨干商量，明确各人的任务之后，即分头做好筹建区政府的准备工作。2 月下旬，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于是在山家新村祠堂门前举行“遂溪县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大会。与会代表有遂溪县各区党组织负责人、各联防区的领导和驻附近的主力部队及群众，会场周围贴满了大红标语。在成立大会上，主持人周斌(周文熙)宣布区政府各任职人员的名单，并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宣传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意义，还颁布了区政府的任务和施政纲领。接着，部队代表郭达辉传达了张炎起义部队攻克国民党吴川县政府和第二支队逮捕处决吴川县长邓侠的喜讯。参加大会的代表和群众闻讯后，情绪激昂，斗志倍增。

区政府成立时，宣布设正副区长各一人，区长全德珠，副区长郑南。下设文书、总务、财务三个部门，由马朝伟任文书，梁乔栋任总务，肖光章负责财务。此外，区政府还配有脱产交通员、保卫员和勤务员等。区政府机关初设于山家新村祠堂，后迁至山家老村祠堂。

区政府下辖四个联防区，每个联防区均设立办事处(相当于乡公所)，并配有正副主任和文书。其中：涧水河北岸村庄为第一联防区，主任叶大茂，副主任邓成景；界炮东南部和豆坡北部为第二联防区，主任李毓淮，副主任肖光章；界炮东部和沙古西部为第三联防区，主任李琼伦，副主任李正纯，文书金子璞；界炮北部和北潭各村庄及安铺以南村庄为第四联防区，主任潘立中，副主任莫兴祥。区政府完全控制的地区约 250 平方公里，人口 5 万左右，是当时南路敌后最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不久，西北区根据地与遂(溪)北抗日联防区及廉江新塘、大塘抗日联防区连成一片，形成遂(溪)廉(江)边抗日根据地。

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和各联防区办事处成立后，在西北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各项工作。有关人员的分工为：全德珠主管政权工作，并重点负责第二、第三联防区；郑南主管武装斗争工作，并重点负责第一、第四联防区；肖光章、马朝伟等除了管理区政府业务部门的工作外，同时要兼顾他们原来所负责联防区的党组织工作。区政府机关设中共临时党支部，书记马朝伟，支部成员一律要过好组织生活，并且都有发展党员的任务。区政府所辖范围内的党组织工作，主要由周斌负责(原区委书记陈章于 1945 年 2 月调离西北区)。党组织采取分片领导和秘密活动的形式，各片的负责人由区党组织指派既是政府工作人员、又是党员骨干的人员来担任，如陈理祥负责第一、第四联防区的党组织工作，梁乔栋、马朝伟分别负责第二、第三联防区的党组织工作。

区政府成立后，树立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正式行使人民政权的权力。其任务主要是组织自卫队，发展人民武装，为主力部队补充兵员；加强乡村联防，反击敌人扫荡，保卫根据地；维持地方治安，保障群众正常生产；开办学校，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筹粮筹款，接待部队，为部队提供军需，协助主力部队整训、练兵。如 1945 年 5 月南路地区抗日主力部队整编为 5 个团时，除第三团在廉江新塘整训外，其余 4 个团共 2000 多人全部集中在西北区山家村一带整训，遂溪人民尤其是西北区人民在为主力团补充兵员、提供军需给养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西北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得很快，除了第一、第二、第三联防区成立脱产常备中队，第四联防区成立常备大队之外，各乡村还普遍组织武装小队或武装中队。1945 年 4 月，西北区党组织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全区的抗日武装，把区内各村队合编为一个抗日警备大队，由张鸿谋任大队长，李绍香任政委，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独立分队。在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的同时，各联防区还开展了学军事、大练兵活动，

使武装队伍的战术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当时，西北区全面动员起来，实行全区联防自卫。联防的方法一般是：各村都用木桩、竹围起来(后大多拆除)，只留一至二道门口进出，村口日夜设有岗哨，区内各通道均有儿童、妇女站岗放哨，若有敌情，即以锣鼓螺角为号，全区武装力量旋即行动，联合打击进犯之敌。为了搞好西北区及周边地区的治安工作，对于那些汉奸分子、敌探和国民党反动乡保长，区政府积极采取严厉镇压的办法，派突击队前往铲除。另外，区政府还在山家村设置一间拘留所，负责监禁和处理各地押送来的反动分子。在财经方面，区政府制定了一套开源节流的措施，除了设站征收税款，发动群众和开明绅士募捐，派出小股武装队伍没收汉奸和反动分子的财物之外，还在河口圩仔开办农贸市场，征收摊位税扩大收入。此外，在接待部队、为主力补充兵员、开展统战工作和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自从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以后，区内社会秩序稳定，群众生产正常，百废待兴，不仅成为雷州半岛以至南路地区抗日斗争的根据地和沦陷区军民的大后方，同时还为后来南路各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建立抗日根据地探索了路子，并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因此，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不但对当时遂溪以至南路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来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2. 保卫根据地 迎接抗战最后胜利

老马起义后，高雷地区的国民党当局甚为震惊，多次出动重兵，乘抗日起义部队主力离开西北区南下之机，频频扫荡西北区。在顽军的疯狂扫荡下，广大人民群众遭到严重的摧残。1944年9月，黄兆昌纠集数百人的反动武装，几次扫荡老马一带的革命村庄，老马村被洗劫一空，全村房屋几乎被烧光。接着，驻安铺日伪军罗忠武部约400人也相继进犯了西北区西部沿海村庄，烧毁金围、斗仑、北潭、老马、龙塘、同文等村的民房40余座，抢走耕牛80多条，劫去猪、鸡、狗、鸭和其它财物不计其数，并有一些群众惨遭杀害。在此期间，日、伪、顽军还接连扫荡了山内一带村庄，其中山内村受害最严重。该村在遭受国民党雷州独立挺进支队扫荡，被抓去6人之后，不久又遭到日伪军的洗劫，被烧掉民房21间，禽畜衣物被抢劫净尽，敌人还丧尽天良地在村内、屋内和锅、碗、井内拉下粪便，撒满垃圾等杂物。1945年1月11日，金围村再次遭日伪军扫荡，被敌人抢走60多条耕牛和烧毁部分房屋。同年春，反动头子梁仲文率部扫荡山家，抢劫三鸟、衣物一大批，还杀害无辜农民李煜农。日、伪、顽军在西北区所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

为了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根据地，西北区广大人民群众在区党组

织和区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联防自卫工作，除了各村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外，还组织群众在山家与老马、竹仔山、车板塘之间挖一条壕沟，修筑了御敌第一道防线。1945年3月初，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支队政委唐才猷在西北区山家老村，集中遂溪各区抗日武装，整编为4个中队，随后开赴豆坡，围攻驻豆坡乡公所的顽军（雷州独立挺进支队第七大队某中队），因对方据点坚固及援兵驰至，四个中队主动撤回山家。5月，第一支队在山家整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俗称“老一团”），并进行短期训练之后，随即挥师南下，会同遂南抗日游击大队攻打驻下担的顽军杨起德部和北坡反动据点。接着，第一团北上围攻杨柑反动据点和阻击黄兆昌、戴朝恩各路顽军。当时，第一团派两个连分别在杨柑西面的月塘岭附近和下六荔枝山周围伏击戴朝恩挺进队，其余兵力全部集中到杨柑西面的蚊仔塘与月塘村之间的山坡上设伏，负责伏击黄兆昌部。当天上午，黄兆昌闻报杨柑据点被困，即率部东上援救，上午9时许进入伏击圈，当即遭到第一团阻击，双方激战竟日，黄兆昌坐骑被打死，只好率部溃退。据守杨柑据点的顽军待援无望，被迫缴械投降。在这次战斗中，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食物上战场，为子弟兵消饥解渴，甚至扛土炮轰击顽军堡垒，表现出高度的拥军爱军精神。是役，击毙顽军2名，俘获中队长以下官兵2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支；第一团指导员陈慎辉牺牲。

杨柑之战后，第一团移师西北区东部，分散驻于山家、白露、田下、桔仔树一带。这时，戴朝恩、黄兆昌又纠集700多人的反动武装自西向东卷土而来，企图追击抗日主力部队和扫荡西北区。为了粉碎顽军的追击和扫荡，保卫西北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雷州特派员陈恩召集唐才猷、黄景文等领导人在山家开会，研究御敌方案。会议决定立即抓紧做好如下四项准备工作：一是于当天（6月3日）上午在山家东村晒场召开军民誓师大会，由唐才猷作战前动员，激励军民的斗志，会后举行歃血盟誓仪式；二是组织群众，加紧构筑工事，力争于几天内在山家东村的东面挖一条半环形战壕；三是组织约300多名群众担负弹粮供给和抢救伤员的任务，并准备好50副担架，具体工作由山家联防队负责；四是由唐才猷具体部署作战方案，决定以青水溪西岸为前沿阵地，坡禾地一带为第一防线，芒溪与上溪村一带为第二防线，山家水沟以西为核心阵地。各个阵地的兵力部署是：前沿阵地由第一团某排和山家联防队一个班把守，任务是打伏击；第一防线由第一团一营第三连扼守，任务是阻止顽军长驱直入山家；第二防线由广西博白的“白马”大队据守，任务是大量杀伤顽军的有生力量。以上三个阵地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完成任务后要迅速撤回核心阵地，以便集中兵力消灭进犯之敌。第一团第二营由郑世英、李鸿基率领在核心阵地严阵以待，负责扼守核心阵地；第三营和第一营一部为预备队；指

挥所设于山家东村。此外，还决定在第一团所驻扎的村庄周围布下地雷，并要求各路部队于6月8日天黑前进入阵地，待机出击。6月9日凌晨，国民党雷州独立挺进支队司令戴朝恩和遂溪县长黄兆昌率领顽军700多人从杨柑经豆坡、青水而来。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金耀烈、教导员王平指挥前沿阵地和第一防线的战士，在坡禾地(第一连)、桔仔村(营部和第三连)、月弓村(第二连)一带阻击顽军。顽军遭到突然袭击，死伤了10余人，于是改变进攻队形，采取战斗队分散进攻的办法，以缩小目标和分散第一团第一营的火力。上午9时许，金耀烈命令第一营转移到长田、上溪一带，进入第二道防线，会同“白马”大队和乡村队继续阻击顽军。当时，山家村农民李毓汉(共产党员)发现敌情后，当即跑回村去报讯，但半路上却碰上另一股顽军。在这危急情况下，他赤手空拳与犯敌展开搏斗，竭力阻击顽军进犯，但终因寡不敌众而英勇牺牲。与此同时，老马一带的联防队在袁荣英等人的带领下，利用战壕碉堡，凭借颓垣破壁，狠狠打击前来扫荡的界炮圩伪军。这次战斗，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才结束，共毙伤顽军、伪军30多人。这次战斗，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和当地群众密切配合，共同作战，是一次成功的人民战争。役后，党组织在山家村举行追悼会，进一步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意志。广大群众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纷纷歃血盟誓，表示誓死保卫家乡，保卫西北区抗日根据地。山家村还成立了“复仇大队”，由李绍香任大队长，发誓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击溃顽军戴朝恩、黄兆昌等部之后，第一团旋即转移到合沟一带休整，并在合沟周围布雷设防，以防敌人袭击。1945年6月27日(农历5月18日)晨，驻安铺镇日军和界炮圩伪军罗忠武部共400多人分东、西两路前来奔袭，其中东路之敌经界炮直扑合沟，西路之敌经均村仔直插金围。第一团立即部署各营分路迎击敌人。同时，金围抗日联防大队也在大队长张鸿谋的指挥下，在村东北面的荒岭上设伏，以墓堆为掩体，伺机歼敌。当西路之敌窜至金围、红埠一带时，金围联防大队首先给予狠狠阻击，接着，第一团第二营和北潭、南坪等村的抗日联防队也相继投入战斗。西路之敌不支而退，人民抗日武装乘胜追击。西面的战斗打响后，第一团第一营即冲向上龙岭，以便抢占有利地形，但到达崩塘村时，却遭到占据上龙村高地之敌的凶猛火力扫射。这时，第一营教导员王平带领一个排英勇冲向敌阵，崩塘村自卫队也绕道向敌人冲锋。但是，由于敌人占领了有利地形，并且装备良好，在敌人密集火力的扫射下，教导员王平等9人英勇牺牲，排长陈景春和陈希平等人也相继负伤。战至中午，人民抗日武装终于占领了上龙岭。下午，敌人败回安铺，沿途丢下钢盔、军帽100多顶。是役，计击毙日兵8名、伪军30多名，伤敌数十名。战斗中，第一团第一营教导员王平、第二营第六连连长陈巨源、排长李真

富等 11 人英勇牺牲。由于军民的密切配合和英勇作战，敌人的围剿再次遭到失败。西北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敌人的多次进犯中，经历了血与火的锤炼，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成为南路敌后一块坚不可摧的钢铁壁垒。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 2 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西北区人民经过 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下 篇

解放洪流

一、调整干部 精简武装 坚持隐蔽斗争

(一)抗战胜利后的基本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北区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渴望和平民主，从此安居乐业，建设家园。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了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恢复和维持其在全国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加紧策划反革命内战，频频派遣军队，占领全国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劫收抗战果实；一方面施放“和平”烟幕，邀请中共代表到重庆谈判。其时，国民党 3 个正规军压至南路、琼崖(其中 2 个军到雷州半岛，重点驻遂溪)，抢占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人民的胜利果实。国民党反动派在强行接收原日、伪军防务及物资的同时，还加紧恢复各级反动政权，建立地方反动武装和特务组织，对抗日根据地和各游击区进行“拉网式”的清乡扫荡，妄图把中共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连根拔掉。在这严峻形势下，中共南路特委为了保存主力，决定以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为主组成主力团，突围西进十万大山地区。

国民党为了急于恢复其反动统治，到处打幡招魂，在西北区起用了一批反动分子和土匪、流氓等，恢复了乡保甲三级政权，同时组织起附属于乡保政权的反动武装。当时，国民党在遂溪西北区恢复成立了四个乡政府，各乡的反动乡长是：界炮张德安，豆坡梁仲文，杨柑杨德成，北坡袁善中。在西北区及外围的反动地方武装有：界炮乡队 30~40 人枪，队长张德安，副队长符一掌，配备轻机枪 1 挺；豆坡乡队及河图仔、葛松村反动武装共 40~50 人枪，队长梁仲文，配备轻机枪 2 挺；遂溪县驻杨柑乡自卫中队，约 60 人枪，中队长陈本序，配备轻机枪 2 挺；北坡乡队 20 多人枪，队长袁善中(兼)；洋青乡中队 50 多人枪，队长叶经纬，配备轻机枪 1 挺；老麦田、古村东联保队 30 多人枪，队长徐春田，副队长徐文林；驻安铺镇的廉江县自卫大队约 500 人枪，由镇长郑贤才带领；廉江永桐乡队几十人枪，由乡长尹爵卿兼乡队长。

国民党反动派恢复建立各级反动政权和武装之后，实行法西斯统治和进行疯狂的军事“清剿”，中共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以至广大群众，相继遭到严重的损失。

1945年9月，原中共西北区党组织负责人陈章在后湖村被国民党反动武装围捕，后受尽酷刑，义不反顾，英勇就义。次年2月中旬，国民党遂溪县长戴朝恩派出县属团队，在张德安反动武装的配合下，疯狂围剿西北区，捉去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数百人，其中李琼伦等共产党员被杀害。此外，马如杰、陈开濂、全德珠等一批党员和干部，遭到国民党遂溪县当局的悬赏通缉。西北区及遂溪县各区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在此期间，中共遂溪县党组织根据广东区党委关于“一方面坚持斗争，保存武装，保存干部；另一方面作长远打算，准备将来合法的民主斗争”的指示，大量调整干部，撤退主力，精简武装队伍，要求全体党员干部紧紧依靠群众和统战关系，坚持隐蔽斗争。

(二)大量调整干部及其活动地区

1946年5月，国民党被迫签订了广东中共武装力量北撤的协议。随后，中共南路特委根据中共广东区党委的指示，安排20多名干部党员参加东江纵队北撤，其中遂溪县有黄其江、莫志中、邓麟彰、马如杰、沈潜、陈宏柱等6人。在东纵北撤前，黄其江、支仁山、沈汉英、唐多慧、陈醒吾、李晓农等人，分别到各区传达上级关于“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以及“作长期打算，准备坚持十至十五年斗争”的指示。

根据上级的方针、指示和有关撤退原则，西北区党组织负责人李晓农具体部署本区的干部撤退工作。这时，有少数党员和干部由组织上安排撤退到外地，如梁乔栋、陈开濂、周锡经、马朝伟、李成伟等人撤退越南，何恩、吴杰、潘立中撤退海南岛，李炳志撤退梅菪镇，等等。大部分党员干部则是由组织上决定外撤、个人自找门路撤退的，他们是：叶大茂、叶大林、李毓淮、张立明、张耀、李炳、李炳光、陈生、肖光章、马观福、邓世荣、李引、张兴业、李毓保、莫波、陈理祥、周斌、全子瑛、周达才、郭石生、张希立等人。此外，由于当时老马、斗仑、金围、山家等一些比较红的村庄，已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因而原来在这些村庄工作的党员干部都必须调整活动地区，分散撤退到本区的长毛田、周灵、鹤塘仔、中间岭、金刚、虾须塘、西湾、江头、田下、福建、槟榔界等比较灰色的村庄。这些党员、干部撤退和调整到新地区后，利用各种关系和途径，或经商、教书、牧牛，或流浪江湖、削发为尼，或扛长工、当保姆等，既要隐蔽身份，又要积极开展工作，伺机开辟新地区。

由于形势的需要，遂溪各级党组织都实行特派员制，采取单线领导、分片负责的办法来开展工作。这时，李晓农为中共西北区特派员，负责西北区的全面工作。协助李晓

农工作的梁甫负责润水河以北地区的党组织工作，何珍则负责润水河南部地区的开辟新区工作。

在这段大撤退期间，西北区党组织还积极配合和协助县和各区党组织撤退干部，曾在南坪、犁头沙先后 3 次用船运送外区干部到合浦、北海等地，人数共 40 名左右。当时，由于白色恐怖极端严重，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处境相当危险和艰苦，因而西北区党组织十分注重形势、党性和革命气节教育，以消除一些人的悲观失望情绪，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意志，巩固党的组织。

(三) 精简武装 化整为零 坚持斗争

1945 年 10 月，主力部队第一团袭击遂溪敌军用飞机场、向西挺进十万大山以后，留在遂溪的人民武装队伍随即进行精简，分散在原活动地区坚持斗争。其时，西北区各联防队、常备队、自卫队等武装队伍，亦都进行了疏散或精简，埋藏起长枪，只保留少数骨干队员和短枪，组成便衣队、别动队、武工队、经济队等形式的小股武装，分散在西北区坚持武装斗争。这些小股武装队伍有如下数股：李晓农便衣队，何珍别动队，陈永哉情报组，占景隆小分队，张耀经济队等。其主要任务是：锄奸反特，肃匪保民，筹款筹粮，配合地方党组织开辟新区和建立两面政权。至 1945 年底，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更大规模的清乡扫荡之后，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处境更加困难，原精简保留下来的武装队伍，由于形势所迫，几乎全都隐蔽起来，有特殊必要时才集中活动。

1946 年春夏，遂溪旱灾歉收，在饥荒与白色恐怖交加的年月里，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战士面临着被饿毙与捕杀的双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这些分散隐蔽的党员和武装骨干人员，也就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在海面上和公路上截船打车，搞一些经济收入，以解决生活上的困难。1946 年春，梁甫、郑贤培、袁玲、马子汉、黄桂、潘金、李引、李炳聪、周金、李保等 20 多人筹备了两张船，在北潭海面上进行筹款活动。有一次，他们截击了一艘官僚资本家的商船，缴获了 10 余万斤大米和一批豆类、药材、布匹等物资。事后，他们把大部分大米分发给群众，将其他物资运到赤坎，交给党组织开设的地下商店出售。同年端午节前夕，李晓农、何珍根据陈永哉提供的情报，带领武工队伏击反动地主陈炳堂(绰号“滚水”)，缴获大银 5000 元。后来，经济队又在新埠一带缉获杨柑某资本家的几十斤烟土和一批走私布匹、棉纱。这些粮食财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党员、干部的经费和生活困难问题，并救济了一部分生活贫困的群众。

(四)继续建立“两面政权”

1945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在进行疯狂围剿革命村庄的同时，还加紧全面恢复乡村政权，以便配合“清剿”和加强对广大农村的统治。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清乡建政计划，利于农村革命活动的开展，中共遂溪县党组织根据广东区党委关于“选择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打进国民党党、政、军、经济、文化、教育机关和乡保甲政权及三青团系统”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严格选择一批未暴露的党员和开明人士、进步群众，乘国民党急于复乡建保之机，打进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中去，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西北区党组织遵照这一指示精神，除了秘密选派一些党员、进步群众及开明人士打入国民党内部充当保、甲长之外，还通过开展统战工作和武装力量加以配合等办法，对一些已经上任或即将上任的保甲长，采取教育或警告的办法，尽量把他们争取过来，或同他们约法三章，不准他们对中共党组织和群众不利；对于一些顽固反动分子，则采取武装镇压的办法将其除掉，另外再由群众推选合适的人士接替。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党组织在西北区建立了一批两面政权，全区的保甲政权已几乎全由共产党所控制，而个别比较顽固反动的保长，因慑于人民武装的威力，也不敢轻易再为非作歹了。

当时，西北区涧水河北部各保甲政权的情况可分为三类：

一是“白皮红心”政权，这类占60%以上。如：老马村保长马巨登，江头村保长赵烈，担水塘村保长李文海，南昌村保长黄明勋，南坑村保长余秉桃，金邦湾保长陈秀初，科港村保长邓如仁，金围村保长张元本，上龙村保长杨廷贤，北坡仔保长毛振坤，上三墩保长林朝清。以上保长中，有的是由共产党安排打进去的，有的是抗战时期的老保长，并且一直与共产党保持联系，有的是党组织通过教育争取过来的。这些两面政权，对于掩护中共党组织在农村的工作和保护群众的利益，都起到很大的作用。如老马村保长马巨登，不但经常到界炮乡公所为中共地方党组织搜集国民党的有关情报，而且在1946年春国民党反动武装围剿老马村后，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界炮保释被抓去的12人。又如金邦湾保长陈秀初，曾为中共党组织提供反动乡长张德安企图谋杀周锡经的情报，使周锡经免于遇难。此外，科港村保长邓如仁除在平时积极带领群众抗租抗税之外，还秘密为地下党组织筹措了20多支枪和一批子弹；金围村保长张元本也一直为共产党搞秘密工作，后来还协助党组织搞垮反动乡长张德安，等等。

二是持中立态度的，这类政权占10%左右。如山家新村甲长李毓彬，黄江尾保长黄焕昌，卢屋村保长卢胜和，他们一向中立，不轻易倾向任何一方。这些人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但没有做不利于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事情。

三是思想顽固反动的，这类保甲长约占 20% 多一点。如红埠村保长吴承英，新坡村保长何永昌，赤坎仔甲长李连焕，山内村保长李宽道，山家东村保长李昌沛等。这些人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收集情报，充当向导，协助反动武装扫荡革命村庄，围捕中共党组织成员及革命干部，严重危害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类反动保长，大多数任期不长，有的很快便被人民革命武装所镇压。

(五)反“清乡”扫荡的斗争

1945 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在遂溪基本恢复各级反动政权以后，即对游击区的革命村庄进行更大规模的“清乡”扫荡。其时，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大肆进行反动宣传，强迫群众自首，并在农村强行实施“五户联保联坐”政策；在军事上把驻防雷州半岛一半以上的正规军集中到遂溪，在地方反动武装的配合下，采取“连梳式”、“拉网式”等战术，重点“清剿”遂溪。在国民党军的清乡扫荡下，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广大农村普遍遭到洗劫，不少妇女被奸淫。在此期间，西北区被摧残得极为严重。其中：老马、赤坎仔一带村庄被焚，20 多名群众无辜被捕，4 人被当场杀害；山家村的革命者亲属被集中押到死去的反动分子坟前，强迫跪地拜祭，给仇敌打蘸招魂，更为残忍的是，革命烈士李康生的母亲被剥光上身鞭挞乳头，辱骂她生育“土匪仔”。此外，杨柑片的清水、龙湾等村，也连续 10 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扫荡，村中所有禽畜、粮食、衣物被抢光，锅碗和其他家具什物被砸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恶残暴，与日本法西斯的“三光”政策无异！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5 年冬至 1946 年下半年止，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区先后杀害了陈章、占景隆、李春、宋秋森、陈冬、李太、李毓保、李琼伦、李昌权、李耀梅、李毓发、李昌梅等 10 多名共产党员和 20 多名群众（其中山家 3 人、山内 5 人、老马 2 人、赤坎仔 2 人、斗仑 5 人、中溪 1 人、槟榔界 1 人、后田 1 人）。在这些被害者中，年龄最高的是斗仑村的周维道（周锡经父亲），遇难时 62 岁；年纪最小的是山家村的李默，他是被国民党活埋的，当时只有 12 岁。

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清乡”扫荡，保卫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中共遂溪县党组织根据上级有关武装自卫的斗争方针，指示各区党组织积极开展反“清乡”扫荡斗争。1946 年 6-7 月间，西北区党组织负责人李晓农召集骨干人员在娘仔村开会，传达上级的有关指示，动员大家大胆地拿起武器，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积极开展锄奸反特活动，坚决镇压一批反动分子。这次会议之后，原来分散隐蔽活动的何珍、梁甫、陈冬、叶大林、周锡典、肖光章等骨干人员，立即集中起来，组成若干个武

装小组，由李晓农统一指挥。这些武装小组组织起来后，在李晓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锄奸肃特保民活动。他们根据县党组织的统一部署，与各区武工队同时行动，于一夜之间在西北区处决了29个反动分子，后又相继杀掉10个反动保甲长。至7月底止，全区共镇压了约40个反动保甲长和汉奸特务分子，其中在磨谷湾和山塘村杀掉9个，在山内村杀掉7个，在眼镜塘杀掉4个，在同文杀掉6个，在山家、双塘仔各杀掉1个。此外，还多次在夜间袭扰国民党界炮乡公所据点，迫使反动乡兵困守巢穴，不敢轻易下乡扫荡。

在人民武装开展筹款活动期间，一些武装土匪乘机作恶，盗用共产党的名义在农村敲诈掠夺群众，有的从润水河南面偷牛到河的北面出卖；有的窜到泥沙渡头鸭寮抢鸭；有的下农田偷番薯、稻谷，或入室盗窃财物；有的在安铺南面的村庄公开抢劫等。匪风之猖獗，既严重地伤害了群众的利益，又损害了共产党的声誉。因此，人民武装在进行锄奸反特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开展肃匪工作，对于一般土匪进行警告教育，促使其改邪归正，对于那些不肯悔改或恶行严重者则进行武装镇压，杀掉了一批，以儆效尤。

经过一段时间激烈的锄奸反特和肃匪斗争之后，西北区的反动保甲长和汉奸特务及恶霸分子，大多数已被铲除，未被除掉的反动分子也害怕得逃往他处，不敢再露面和作恶。国民党当局由于失去这些爪牙和耳目，再也不敢贸然下乡扫荡，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威胁大为减少了。

二、健全党政机构 加强根据地建设

掀起武装斗争新高潮

（一）全国内战爆发后的形势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于26日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这时，原驻防遂溪的国民党正规军虽然相继北调参加正面战场作战，但跟着又有广东省国民党保警部队前来接防。国民党遂溪县当局为了支持蒋介石反动集团打内战，巩固其反动统治，一方面加紧征兵、征粮、征税；一方面改编和充实各级地方武装，成立县属自卫大队和警察中队，整编原联防大队为联防中队，改编区乡镇自卫队为警察小队，同时调整加强乡镇政权，与湛江市①联合举办“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大量培训保长，并实行“联防联剿”、“联保联坐”等反动政策。

其时，天降旱灾，野无青苗，到处怨竹结籽，广大农村濒于破产，人民群众备受饥饿，生计无望。在这水深火热的危难关头，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施行“三征”暴政，置人民于死亡线上，因而普遍引起各阶层人民的极端不满，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他们已被反动当局逼得走投无路，唯有奋起反抗，才能求得生存。在这民怨蜂起、民心思变的形势下，如果有人加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随即揭竿而起，闻声响应。这种形势，极有利于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开展自卫斗争。

在全国内战爆发前夕，中共广东区党委派吴有恒任中共南路副特派员，向南路各地党组织传达中共“七大”精神和广东区党委于5月6日发出的《致各地紧急指示》。指出：全国内战形势紧迫，各地人民武装必须重新估计时局，不应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而应坚持分散的自卫斗争，坚决、主动打击反动派，粉碎其一切阴谋，以保存力量，争取局势好转和停战协定的实现。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共产党是有力量取得胜利的，务必坚定信心。新的全国内战爆发后，中共南路特派员对南路地区的斗争作了新的部署，要求各地停止消极的撤退、隐蔽，坚持党的领导和自卫斗争：集结小股主力，镇压极端反动分子，打击清乡扫荡的反动武装；建立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两面政权”；发展人民武装，保卫暴露地区和积极开辟新地区，建立长期坚持据点。1946年7月，中共西北区党组织遵照上述指示精神，号召全

区党员立即行动起来，发动群众恢复农会、同心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并在

①1945年8月，法租界广州湾收归中国，易名湛江市。

“两面政权”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密切配合下，积极开展以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为中心内容的自卫斗争。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西北区党组织决定恢复交通情报站，除了在北艾村设立区交通中心站外，还在许多村庄设立联络点。这些交通情报站点，互相联系，交织成网，有的还与外区、外县直接取得联系。此外，还继续开展锄奸活动，于7-8月间，在杨柑至安铺的主要路口一连杀掉8个带兵“清乡”的反动分子，并在尸体上留下字条，公布其罪恶，以儆效尤。

至此，西北区人民自卫斗争的声势不断扩大，群众的革命情绪逐渐高涨，革命斗争的形式开始从隐蔽转为半公开。

（二）恢复公开的武装斗争

1946年7-8月间，西北区党组织负责人李晓农根据中共南路特派员和雷州特派员的指示精神及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集结武装，打出共产党的旗号，恢复公开的武装

斗争。其时，分散在西北区活动的部分武工队员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 20 多人枪的武装中队，由李晓农任中队长，周锡典、郑贤培任副中队长，陈冬任指导员。该中队一成立，即开赴长毛田村，伺机出击敌人。由于行踪暴露，遭到国民党遂溪县北区联防主任兼界炮乡乡长张德安所率反动武装的突然袭击。武装中队猝不及防，在分散撤退中，陈冬、周锡典二人相继负伤。李晓农撤至村边晒场时，利用灌木林边的茅草片掩护，避开了敌人的追击。陈冬因患疟疾病未愈，腿部负伤而被捕，并被押至晒场审讯。陈冬义无反顾，当面怒斥张德安等反动分子，表现出共产党人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最后被杀害于晒场上。

这次集结武装，因国民党反动武装的突然袭击而遭到挫折，但它揭开了遂溪县从分散隐蔽转上集中公开武装斗争的序幕，其意义是重大的。

不久，遂溪县党组织根据南路特派员的指示，成立军事小组，由李晓农任书记，金耀烈、郑世英分别任正、副指挥，负责领导遂溪及雷州半岛的武装斗争。1946 年 9 月底，在军事小组的领导下，西北区部分武装人员和全县各区的武装人员集中编队，成立了 5 个武装中队，共有 200 多人枪。11 月，中共南路特派员吴有恒向下传达广东区党委关于“不违反长远打算，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武装斗争方针。次年春节期间，吴有恒又在湛江市赤坎召开雷州和化吴、廉江特派员会议，研究大力开展武装斗争的计划，同时要求遂溪等县的游击队，设法除掉 1-2 名如戴朝恩(诨号“铁胆”)之类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以此作为大搞武装斗争的起点。

西北区的部分武装人员自 9 月底被编入县的武装中队之后，在军事小组的直接率领下，相继在城月、遂安公路、江洪、乐民等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并于 1947 年 3 月 8 日在遂湛公路的大路前桥附近击毙国民党陆军少将兼遂溪县长戴朝恩。戴朝恩被击毙后，南路地区的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各地反动分子惶恐自危；而广大革命军民则情绪高涨，斗志旺盛，各地纷纷出现农民群众弃锄从军、学校师生投笔从戎的可喜局面，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发展。至此，遂溪及南路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迅速转上高潮。

(三) 掀起武装斗争新高潮

1. 区乡村队的建立和发展

南路地区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反动派刽子手戴朝恩被击毙之后，遂溪以至整个南路地区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一方面就是人民武装力量迅猛发展。

1947 年 3-4 月间，遂溪县相继成立了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一、第二团，同时

各区也都组建起区、乡、村队等人民武装。这时，西北区除了选送部分武装骨干参加新一、新二团外，还成立了2个区中队(7月份分区后一个中队归属西区)，第一中队长叶大林(8月后张弟)，指导员郑杨兆，副中队长张弟；第二中队长阿曲，指导员王炳旺，副中队长王其森。8月，根据武装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成立一支扩军队，队长叶大林。区中队的战斗力比较强，主要任务是在本区内开展武装斗争。扩军队一般由乡队骨干和在本区治伤的主力部队战士组成，主要任务是吸收和训练武装人员，随时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并协助维护本区的治安。

在组建区级武装的同时，各乡、村也普遍成立了乡队和村队。乡队的任务主要是保卫本乡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安全，并为区级武装补充兵员。各乡队的基本情况是：界南乡队7-9人，由李志严负责；界东乡队15人左右，由李炳勋负责；北联乡队4-5人，由莫嗣谟负责。各村队的建立也很普遍，几乎各村都有村队，其中有30多条村庄的村队配有枪支弹药，其余村队只配备长矛大刀。(1947年7月后涧水河以南地区划为西区，故此不罗列涧水河南部各乡、村队的情况。)

西北区自从1947年3月公开建立武装以后，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得很快，至年底，全区共拥有200多人的脱产武装(不含7月份分区后西区的武装人数)；另外还为主力部队新一、新二团输送了第三批兵员，总人数达150多名，为遂溪县以至粤桂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 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

遂溪县及南路地区大力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慌，相继调遣广东省保警第十、第九、第一总队到遂溪，一方面寻找人民武装主力部队决战，另一方面在地方反动武装的配合下重点“清剿”遂溪游击根据地。1947年4月，国民党遂溪县自卫队进驻山内村，由山内反动保长李宽道带路，连续三天扫荡山内一带村庄，群众备受摧残。同年5月，界炮反动乡队围剿北艾村，企图一举端掉西北区交通情报总站(该站已从北艾迁至车板塘)。西北区妇女工作骨干人员李兰(邹沙莲，中共党员)获悉此情报后，当即从车板塘冒险跑往北艾通知马凤、马妹等交通员撤退，不幸被敌人逮捕。当时，马凤的母亲双手紧紧抱住李兰不让反动乡兵拉走，被乡兵用枪托撞倒在地上。李兰被关进国民党界炮乡公所监狱后，日夜备受刑讯诱供，始终坚贞不屈，于第三天被杀害于乡公所南面的荒岭上(现界炮中学附近)。李兰被押赴刑场时，沿途高呼革命口号，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她这种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深深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

在国民党反动派重点“清剿”的严峻形势下，西北区广大军民进行了激烈的反“清

剿”斗争。1947年春夏间，驻合浦国民党团管区派一个排押送100多名壮丁往湛江军营集训，在路经北联乡时，被当地村队伏击，一时慌乱无措，急忙丢下壮丁逃命。村队截救壮丁后，派船将他们送回原籍。同年7月某日，国民党遂溪县自卫队梁廷和中队扫荡山内村一带。次日(界炮圩期)，新一团采取诱敌就歼战术，派郑南等几人到潭尾河仔公开收税诱敌。梁廷和中队果然中计，当其由反动保长李宽道带路奔袭收税人员时，在石仔墩村附近却遭到新一团的伏击。是役，俘获反动保长李宽道，毙敌数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数支。同月，叶大林带领区扩军队在北艾村击退前来扫荡的界炮反动乡队，后又几次与国民党界炮乡队发生小战斗，反动乡队均不支而退。在此期间，活动于西北区的新二团第一连曾攻克国民党烟楼保公所据点，继而在曲水泊等地迎击进犯之敌，毙敌5名，缴获枪数支。

(四) 建立健全党组织和人民政权机构 建设和巩固游击根据地

1. 区乡村党组织的普遍恢复和健全

1947年5月，遂溪县党组织遵照中共粤桂边地委的指示，取消特派员制，成立中共遂溪中心县委员会。由沈汉英任书记，沈斌任副书记，陈醒吾、陈开濂、陈兆荣为委员。同时还成立8个区委员会，其中西北区委委书记何珍，委员梁甫(管组织)、李超儒(管宣传)、陈耀南(管武装)、周锡经(兼区长)、梁乔栋(兼副区长)。同年7月，为了便于领导，以涧水河为界将原西北区划分为两个区，河的南部为西区，河的北部仍为西北区。这时，何珍调任西区区委书记；西北区委员会领导成员调整为：区委书记梁华栋，委员周锡经(兼区长)、梁甫。

在成立西北区委员会的同时，还成立了3个党总支和38个乡、村党支部及党小组，党员人数达304人(不含涧水河南部地区的党员)。各乡党总支的情况如下：

界东乡：党总支(设在长毛田村)书记李炳，委员有李毓淮、欧秀琦、李炳球、周韩(管宣传)。下辖山家新村、山家老村、山家东村、山内、新村仔、下村仔、眼镜塘、双塘仔、灯盏塘、槟榔界、平坦塘、古村西、上溪、长田、车板塘、桔仔树、中溪、南坑、白沙塘、鱼鳞塘、算命村仔、织箩村、金刚村、大基头、长毛田等22个党支部和党小组，共有党员150名。

界南乡：党总支书记叶大茂(后李志严)，副书记袁荣英，委员有李志严、叶大林、邓辉、李志常、马朝英、李春驹。下辖老马、坛上、合沟、北潭、斗仑、同文、赤坎仔(龙塘)、竹仔山、枫树(科港)、田下(西湾)等10个党支部，共有党员93名。

北联乡：党总支部书记马朝龙，委员有莫兴祥、张红泮等。下辖金围、下岭、烟墩岭、犁头沙、天鹅墩、长鵞山等6个党支部和党小组，共有党员63人。

随着党组织的不继发展壮大，西北区的妇女党员也不断增加。为了利于对妇女党员的领导和开展工作，1947年农历7月中旬成立了西北区妇女党总支部，由林英任总支部书记，委员有欧秀琦(管学习)、黄兰芳(即黄丽芳，管组织)。妇女党总支成立时，有女党员20名左右，不久发展到30多名女党员。

2. 区乡村人民政权及其附属机构的建立

1947年5月，遂溪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西北区也成立了区人民政府和乡、村人民政权。区政府和各乡镇政府的负责人是：区长周锡经，副区长梁乔栋(7月后调任西区区长)，区政府机关设在长板塘村，秘书马朝龙；界东乡乡长李毓淮，界南乡乡长李志严，北联乡乡长莫兴祥。各村大都成立了农会，并配有农会长。村农会负责处理本村民事、生产等方面的问题，还负责发动本村群众捐集粮、款、枪支等，从而支援革命斗争。为了适应武装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西北区人民政府成立以后，立即恢复、建立和健全交通情报站、税站、修械所、医疗所、被服厂等一系列附属机构：

(1)交通情报站。区设交通情报总站一个，站址先后设于车板塘、鹤塘仔，由李炳球任站长，配有马观英、马凤、吴文才等脱产交通员(后有变动)。下设分站若干个，其中站址固定的有双塘仔和安塘两个分站。双塘仔分站由李炳煜(后马成儒)任站长，交通员有林康盛、卢光、杨华全、李六、何章、洪同、李妹、马养等，主要负责与本县西、北、中区和廉江县安铺镇等地联系。安塘分站设在陈开瑞家里，由陈合负责，没有脱产交通员，信件有时由陈合送。站址比较固定的分站有老马、双塘仔、鹤塘仔、坛上等村。其余分站的流动性比较大，既无常址，又时间短暂，一般是随着主要领导人的转移而迁徙，或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扫荡而转移。另外，在斗仑还有一个水路秘密交通站，由周锡典负责。该站表面上是经商、搞水路运输，实际上是与合浦等地互通情报，秘密联系。其他小联络点建立得很普遍，几乎村村都有联络点。

除以上交通站外，还在界东乡、界南乡、北联乡和南坑村、安铺镇等处设立情报站，专门负责收集西北区及外围敌人的情报。各情报站机构和人员配备情况如下：界东乡情报站站长洪同；界南乡情报站站长李亚祥，情报员陈开瑞、邓辉、李志严等；北联乡情报站站长莫嗣谟，情报员莫嗣瑶等；南坑情报站站长余炳秀，情报员李东、余正谷、陈甫等，负责利用统战关系了解驻安铺敌军的番号、人数、装备、动向等情况。1948年后，西北区委还在安铺设立一个秘密情报站，负责人洪培脚，由区委书记叶卓锋直接联系。

这些交通情报站网络的恢复和健全，对革命斗争的开展起到了很大作用。这项工作十分艰巨而且危险，交通情报人员除在平时递送信件情报、侦察敌情、接待外来党员干部之外，还要在刮风下雨、河涨水急、月黑路岖、敌情严重等特殊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因而他们必须具有不怕艰苦、英勇机智、严守秘密和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在交通情报工作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例如：妇女骨干李兰在北艾村被敌人逮捕后，备受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以年轻的生命保守党的秘密；老马村老交通员吴大妈深夜冒雨强涉涧水河，被湍急的河水卷走很远，险些牺牲；坛上村小交通员邓旭，在送情报往杨柑后田交通站的途中，被涧水河淹死，当时只有十二三岁。又如女交通员李妹，有一次从中区带回一份情报，途中被敌人发觉追赶，走至悬崖时，毅然纵身跳下去，不让敌人抓“活口”。敌人见她浑身是血，以为已死，便悻悻离去。后来，李妹被附近的一位村民背回村中抢救了过来。由于有这样一支坚强的交通情报队伍，因而，西北区的交通情报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交通情报站从来没有遭到破坏，也没有一个交通员变节投敌。

(2)税站。西北区人民政府在南坪(后西岭)、山内和咸港渡分别设有收税站。其中，南坪站为水路税站，主要是在西部海面征收越南、北海、合浦、东兴、海南岛等地过往商船的货税，配有武装税收人员袁玲、黄桂、吴丕本、符祝、卢尚锦、潘金等。山内站和咸港渡站均为陆路税站。山内站主要是在东部公路征收廉江、湛江、海康、徐闻等地的过往货税，站长李炳聪，配有武装税收员李豪、洪同、陈湘、全烈等。咸港渡站主要是负责征收界炮至廉江营仔及广西方向的陆路货税，负责人有李炳勋、莫嗣谟、杨同、卜聪等。全区的税收工作，初期由区委委员周锡典负责，1948夏以后相继由李豪、王景光、卢尚锦负责。在成立人民政权以前，税收工作不够正规化，既无规定税率，又无税单凭据。1947年5月成立人民政府以后，全县各区都统一了税率和税单，税收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凡征收税款后一律给货主发税单凭据(另留一联作存根)，让货主持单据通行于本县及南路游击区，不再缴交货税。当时，遂溪县有两个收入最大的税站，其中一个就是西北区的南坪站。该站平均每天收入200~300元光洋，多的时候则高达1000多元光洋。

税收是人民武装部队和地方党员干部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国民党当局把这些税站视为眼中钉，经常派兵进行围剿或化装偷袭，妄图拔掉这些税站，切断中共地方组织和革命武装的经济来源。由于这样，双方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夺税斗争。1948年农历正月16日，国民党派出一股武装化装成商人，乘船突袭西北区的海上税站，

黄桂、符祝、吴丕本 3 人在激战中英勇牺牲，只有袁玲一人脱险。事后不久，国民党又出动 100 多人的反动武装，连续 3 次从水路偷袭西北区沿海税站，4 次包围袭击西北区陆路税站。在反动武装的频频包围袭击下，西北区的海陆税收人员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激烈斗争中不断经受锻炼和考验，更加英勇顽强地进行税收工作，使税站上的红旗一直飘扬到解放。

(3)修械所。早在 1944 年，遂溪县党组织就在西北区老马村设立了修械所，由马如铃任所长。后来该所转移到遂溪中区，日本投降后曾一度解散。1947 年 4-5 月间，党组织根据武装斗争的需要，又在老马村重建修械所，由招离、马如铃先后任所长。在修械所工作的西北区籍人员先后有马里生、周华生、马如录、福仔、马华扶、陈秀、赵树槐、赵汉、周锡润、周锡玲、邓发、何恩、张马等人。修械所没有固定的地址，成立后不久便迁至长板塘等地。修械所的任务主要是修理各种枪械、翻制子弹(一般用铜钱铸制子弹壳)、制造地雷等。修械所的工作人员时刻面临着两种危险：一是敌人的围剿袭击，二是本身工作可能导致的意外事故。1948 年下半年某日，马里生、周华生、福仔、邓发等人在上濶村为前线赶制一批弹药时，不幸发生严重爆炸事故，马、周、邓 3 人牺牲。

(4)医疗所。1947 年 3 月南路地区掀起革命武装斗争高潮之后，由于战斗日益频繁，伤病员逐日增多，遂溪县人民政府特设立两间流动医疗所，配备专职医务人员，负责全县的医疗工作；同时要求各区也都设立医疗站或护理站，以利伤病员能就近治疗和减少县医疗所的压力。当时，西北区人民政府没有设立固定医疗站，一般是把伤病员分散到堡垒户中去医治，或者是集中到深沟丛林里治疗。护理工作主要由女党员、先进妇女和堡垒户负责。她们平时要爬山涉水挖草药，筹钱买药，日夜护理伤病员，若遇上国民党军前来围剿扫荡，还必须把伤病员及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她们把恢复伤病员的健康作为自己的天职，因而宁愿自己挨饿受冻，也要设法让伤病员吃得饱、穿得暖。她们对革命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

3. “清算”斗争与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

西北区的区、乡人民政府和各村农会成立以后，根据中共遂溪中心县委和遂溪县人民政府的部署。于 1947 年下半年开始进行清算地主的斗争。当时，西北区委和区政府曾在上三墩举行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向地主清算。接着，便对地主欧宝廷、李正甫等进行清算，并解放了欧宝廷家中的一名婢女。但是，由于这种清算斗争比较严重地损伤地主的利益，加上当时西北区内尚有不少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势力，因而一些群众思想上存在着顾虑，不敢大胆领取清退的财物。在开展清算斗争期间，大多数地主慑于

人民的威力而不敢登门催租，有的连农民送租上门也不敢接纳。然而，由于历史条件不成熟和农民群众思想顾虑较多等因素的限制，致使清算斗争的效果并不显著，于是转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双减”运动的政策(即二五减租、三七减息)比较适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深得人心，既得到农民佃户的拥护，又能使地主债主易于接受。这种“双减”工作，具体由各村农会负责，做法上比较灵活，效果很显著。其时，全区共减除的租谷达 5000 担左右，并解放了一些婢女。

三、巩固党政组织 横扫反动势力 解放西北区

(一)主力部队东西挺进前后的形势

1947 年冬，国民党“粤桂南区清剿指挥部”采取“固点联线，分割包围；集中兵力，重点清剿”的战术方针，调集 4 个保安团、九二旅 2 个营和茂名、电白、化县的反动地方武装共约 5000 人的兵力，对化(县)吴(川)地区实行“分割包围，重点清剿”，年底恢复了对化吴地区的反动统治，继而又调集重兵到遂(溪)、廉(江)地区，妄图用搞垮化吴的伎俩来搞垮遂廉，实现其对高雷地区的全面统治。

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汹汹来势，中共粤桂边地委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决定将遂溪主力部队新一、新二团和廉化吴地区的部分武装组成两支主力部队，分别东进粤中和西进十万大山，从而打破国民党的“清剿”阴谋，保存主力，向外发展。在主力东、西挺进前夕，化县、吴川、茂名等县的党员干部和人民武装数百人，由于难于在本地坚持活动，而相继转移到遂溪游击根据地，在经费、粮食等方面给遂溪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加上东、西挺进的主力部队急需一笔经费和大批粮食，因而遂溪的财经、粮食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强烈革命热情和高度政治觉悟的西北区人民，一方面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继续坚持斗争；另一方面在党组织的发动下，积极筹粮筹款，支持邻县党组织和部队，并派出武装人员收税缉私，积极为东、西挺进部队筹集经费。

1948 年 2-3 月间，东、西挺进主力部队相继离开高雷地区。此后，主力部队中的部分西北区指战员，同粤中人民和十万大山人民一道并肩战斗，为当地人民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此之前，党组织从西北区抽调了梁甫、叶高、马朝龙等干部到信宜、阳江、阳春去支援当地的革命斗争。主力部队东西挺进后，革命武装力量较前减少了。

其时，粤桂边区的国民党反动头子张瑞贵执行国民党广东省府主席宋子文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清剿”总方针，一方面对遂溪游击根据地，特别是与廉江交界的遂北地区（即西北区、北区），进行残酷的“清剿”扫荡；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特务分子，大肆进行反动宣传，妄图瓦解中共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武装。此时，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十分嚣张，二三十人的小股武装也敢出来扫荡。1948年3月，国民党豆坡乡队扫荡山家、田下、西湾、老马、竹仔山、福建等村，抢走耕牛12条。4月上旬，驻安铺国民党反动武装扫荡西北区沿海村庄，逮捕了地下情报站负责人余炳秀之弟余良（勒索款后释放）。接着，国民党遂溪县自卫队又纠合杨柑、豆坡的乡兵扫荡西湾、江头等村。由于国民党的频频“清乡”扫荡，革命形势暂时转入低潮，但这种沉闷局面持续并不久，至这年4月中旬便逐渐被打开了。

（二）整顿巩固党组织和人民政权

1948年1月1日，原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军需主任叶卓锋奉命返回西北区工作。这时，西北区委组织进行了调整，原西北区区委书记梁华栋调任廉江县沙铲区委书记，由叶卓锋接任西北区区委书记，区委成员6人。各区委成员的分工是：叶卓锋负责全区的党组织工作；周锡经仍兼任区长，负责全区的行政和开辟新区工作；叶大茂兼任区农会长和界南乡党总支部书记，负责全区农会和界南片工作；李炳兼任界东乡党总支部书记，主要负责界东片工作；张立明兼任北联乡党总支部书记，主要负责北联片工作；林英任组织委员兼妇女党总支部书记，负责全区的妇女工作。区政府几名主要干部的分工为：马成儒任交通总站站长，专门负责交通情报工作；潘立中专管财经；马观福协助周锡经开辟司马塘、古村东、古村西一带的新区；袁玲负责全区的武装斗争工作（后兼任飞鹰连连长）。

1948年2月10日（春节），中共遂北县委在西北区金刚村糖寮屋宣布成立，书记马如杰，副书记陈醒吾，委员陈开濂（兼遂溪县人民政府县长）、周德安、何珍、何德。西北区党组织归属遂北县委管辖，区委书记叶卓锋于1949年1月参加县委。

遂北县委成立后的同年3月中旬，中共粤桂边地委召集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传达学习中共香港分局关于《粉碎蒋宋进攻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信》，部署今后的党建、武装斗争等工作。随后，西北区委根据县委的决定，几次召开区委会议，对加强党内团结，普遍进行“三查”（查成绩、查立场、查生活）“三整”（整非群众观点、整自由主义、整小圈子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工作进行了研究，并着手部署了有关工作。

1948年4-5月间，中共西北区委主要负责人先后两次到东区龙湾和中区新村场，参

加中共粤桂边地委主持的整风学习。随后，西北区委组织各乡的党政干部，传达学习粤桂边地委组织部长黄其江起草的《总路线、总政策学习提纲》，使全区各级干部在理论和实践上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思想、政策战略水平均得到明显提高。6月，区委和区政府负责人参加全县区级以上干部会议，学习粤桂边区党委(原粤桂边地委已撤销)在东海岛举行的整党整军会议精神，会后逐级向下传达学习。通过系统的学习和整顿，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策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组织纪律性和民主作风得到了加强，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达到了纯洁和巩固。

(三) 建立主力连和开辟新地区

1948年4月7日，遂溪县党组织根据粤桂边地委关于“广泛组织武装，重建主力部队”的指示，以原新一团第八连、新十二团第一连为基础，另抽调部分区中队武装，在西区安贡村成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支队第八团。这时，西北区有近40名区中队队员被编入第八团，成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的成员。第八团成立后，于同月9日在遂安公路骑牛铺仔附近伏击全歼国民党广东保一团某排。

骑牛岭之战后，当地的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急忙采取残酷的手段进行报复。4月15日(农历3月初7日)晨，国民党遂溪县长梁传楷亲率该县自卫大队300多人，在洋青乡中队和老麦田、古村东联保队等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分三路围剿西北区东部的槟榔界村，逮捕该村周锡珠、周立、周祥、周壮、周英、周觉、周维福、周维就、周康泽、陈泰、陈九、杨保等15人(其中有6人是中共党员)，并押至村前岭进行审讯，逼问周秋供出谁是共产党员。周秋宁死不招，被当场杀害。接着，其余14人被押往国民党遂溪县洋青乡公所囚禁，备受电刑、辱刑，始终坚贞不屈。党组织知道此消息后，立即研究营救方案。当时，该村老汉周维善自告奋勇，毅然前往洋青担保被捕人员，却反遭国民党扣押，一同解往遂溪城，继续严刑逼供。被捕的15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受尽酷刑，义不反顾，无一变节。国民党反动派无计可施，于是图穷匕见，极端残忍地将陈华剖腹取肝，继而砍掉周觉的左手，最后进行集体枪杀。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抓15名、杀16人”的槟榔界血腥惨案。该村是一个只有20多户、100余人的小村庄，惨案发生后，致使大部分村民陷于“无父无夫无子”的悲惨境地。由此可以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是何等心狠手辣，何等凶残无道!事后，中共西北区委积极做好善后工作，深入该村安慰受害者的家属，激励他们化悲痛为力量，坚强地站起来与敌人作斗争;同时，区委还派区的得力干部马观福到槟榔界村担任该村的党支部书记，尽快恢复该村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由于这样，槟榔界村很快便恢复了革命生气。

1948年5月2日，第八团在西区党组织的配合下，取得了全歼国民党遂溪县自卫大队驻杨柑第二中队的胜利。第八团在成立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取得了骑牛岭和杨柑圩两次战斗的胜利，这对当时遂溪以至高雷地区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同时振奋了广大革命军民的斗志。于是，高雷地区的沉闷局面被打开，遂溪县各区迅速建立起独立主力连(相当于区中队)，逐步掀起了革命武装斗争的新高潮。

1948年5月，西北区以原扩军队为基础，并从各乡队中抽调部分骨干，整编成立飞鹰连，由袁玲任连长，马成彬任指导员，全连110人左右，分为三个排。飞鹰连成立后，其任务主要是打击进犯之敌，警卫区委、区政府，保护税收，维持区内治安，以及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1948年10月，杨柑、豆坡两乡的反动乡队共100多人联合扫荡涧水河畔的海田一带村庄，遭到飞鹰连的狠狠打击，仓惶溃退。同年12月，飞鹰连在区委的率领下，包围国民党界炮乡公所，解除反动乡队武装，拔除了国民党设在西北区的最后一个据点。1949年2月，飞鹰连被整编入遂北独立营，后又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二支第五团。

1948年夏初，高雷地区的沉闷局面被打开，革命形势逐步恢复和发展之后，为了加强遂溪县与广西、合浦等地的联系，遂溪党组织和中共粤桂边地委先后指示西北区委派员开辟黑坭岛，以便打通南北水路交通，为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武装部队建立落脚点。据此，西北区委于1948年5月派遣周锡典、邓辉等人前往黑坭岛，进行开辟新区工作。该岛有3条村庄，共约1000人口，周锡典等人在岛上积极宣传发动群众，很快便组织起一支五六十人的武装队伍，不久又发展到黑坭岛附近的英罗、对达、闸利、大观沙以及北海岭附近的滚沙岭等地。黑坭岛等地区的群众基础较好，先后筹集了70多支长短枪运到西北区，大大地充实了西北区飞鹰连和乡村队的武器装备。同年8月，叶大林又奉中共粤桂边区党委组织部长黄其江的指示，重进黑坭岛，继续开辟该岛及附近村庄，并带领廉江一个武装中队在岛上活动，后转回大陆，整编入广西人民武装主力部队。

(四) 筹集军粮 自制被服 支援前线

随着脱产地方工作人员和人民武装队伍的发展壮大，粮食供给问题给遂溪增加了很大的压力。西北区田少地瘦，粮食欠缺，群众比较贫困，但是，为了支援部队，区委和区政府仍千方百计发动群众筹粮，努力完成军粮任务，并安排全烈、庞喜等人专门负责筹粮工作。

筹集粮食的办法主要有三种：即派粮、借粮和捐粮。派粮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

和中农。派粮时，一般采取预派的办法，即事先通知对象户，宣布派粮数目和交粮的大约时间，让其有所准备，以便部队来时能及时交出粮食。借粮的对象一般是略有余粮的农户，还粮的日期不定，早的几天便偿还，迟的则到解放后才还清。1949年后，凡派粮和借粮都给对象户发派、借粮单，单上写明派、借粮的数额，并盖有“遂溪县人民政府”的印章。捐粮是一种群众性的运动。一般是在派、借粮尚不能满足供给的情况下，才发动全区群众捐献粮食，所捐的粮食大多是番薯、薯干、黄粟、大米之类。1948年，西北区开展过两次捐粮运动，一次是在春初，即化吴部队和干部南撤遂溪的时候；一次是在年底陈一林起义后转移到西北区之时。

早在1947年夏，西北区党组织便通过统战关系，在北坡仔村办了一间地下工厂，发动和组织群众纺纱织布、缝制被服，支援部队。北坡仔属国民党安铺镇的第二保公所管辖，该保的保长叫毛振坤，是北联乡安塘村女共产党员陈合的姐夫。由于有这种关系，所以，1947年下半年区委组织委员梁甫在安铺镇南部开辟新区时，特布置陈合对毛进行摸底，当了解到毛是一位比较开明的保长后，便开始做毛的统战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为中共地方党组织服务，成为一个“白皮红心”的保长。有了这个可靠的基础之后，党组织考虑到北坡仔村是一条新开辟的村庄，虽然距安铺很近，但不容易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如果在这里办地下工厂，是比较安全的。因此，区委派梁甫以安铺商人的身份，与毛振坤合股办织布厂，由陈合当厂长，毛振坤当副厂长。当时，区政府筹集了一笔资金，为地下工厂购置了十几台织布机和大批棉纱；同时，武装经济队缉获的走私棉纱布匹，也运到北坡仔村加工。该厂平时有工人20多人，每天可织布20-30丈。加工棉被、棉背心时，一般是把布、棉、线纱等材料分到各家各户，让群众帮助缝制。群众的热情很高，对分配下去的任务都能按时完成。据不完全统计，该厂自开办至解放时止，共加工了1000多张棉被和1000多件棉背心。此外，区政府还通过余炳秀的关系，购买回100多张棉毡。这些棉被、棉毡、棉背心，全都输送给部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民子弟兵的温暖问题。

(五)分化瓦解反动势力 解放西北区

界炮圩是国民党乡公所的所在地，反动势力最集中，是国民党在西北区的统治中心。中共西北区党组织早想拔除界炮乡公所，但由于乡公所据点比较坚固，防守严密，据点附近的新坡村和界炮村缺少革命群众基础，加上区内人民武装力量较少，并缺乏攻坚武器，因而一直未能对其采取行动。乡公所据点内主要有两个头目：一个是乡长张德安；另一个是乡队排长李秋生。张德安是土霸出身，为人凶狠、残忍和贪婪；李秋生在国民

党军队里当兵多年，有一定的军事知识，是张德安的得力助手。根据这种情况，党组织吸取过去用包围强攻的办法难以拔除乡公所据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斗争策略，采用分化瓦解敌人的办法，智拔敌据点。

1948年春，西北区党组织与张德安约法三章：一是国民党派兵前来扫荡之前要及早向中共党组织报讯；二是其乡兵到上山、铺仔圩收税时不准带枪；三是人民武装对张的过往商船不予干扰。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双方表面上的互利关系麻痹张德安，以便派人打进界炮乡公所内部，从而随时了解敌人情况和秘密进行分化瓦解工作。这年3月的一天晚上，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三团与打进国民党界炮乡公所的“内线”内外策应，取走了敌乡队的轻机枪。事后，张德安大为恼火，盛怒之下杀掉了李秋生。李是国民党遂溪县参议员李品三的心腹，秋生之死，必然导致了张德安与李品三之间的尖锐矛盾。于是，党组织便利用张、李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加深他们的仇隙，另一方面对张德安展开政治攻势，通过张元本（与张德安有同姓的宗族关系）去做张德安的工作，劝他辞官还乡经商，以求苟安。张德安深知自己斗不过姓李的，其本人又在界炮一带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若再在界炮一带出入，便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同时，人民解放军已在华北战场取得节节胜利，全国革命形势正日益好转，国民党政府则如江河日下，败局可见。因此，他只好与中共西北区党组织谈判，答应辞职还乡，不再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要求共产党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及其以后经商车船的安全。西北区党组织考虑到张德安的辞官还乡和改道经商虽然是出于被迫，但他离开西北区后对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很有利，因而答应了张的要求。约于1948年6月，张德安被迫辞官逃往安铺镇。

张德安垮台后，由原界炮乡副乡长兼乡队副符一掌接任其职。中共西北区委根据符的思想实际，把他与张德安区别开来对待，并根据他与邓成中同过学的关系，派周锡经、邓成中去做他的统战工作，向他宣传革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设法争取他投诚或起义。符一掌经教育后终于认清了形势，毅然决定缴械投诚。当时，雷州半岛的反动势力还比较强大，如果符公开投诚，则会引起反动派的憎恨，而对符的安全不利。因而，西北区委决定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掩护符一掌投诚。1948年1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袁玲按照区委的布置，带领飞鹰连突然包围界炮乡公所，向据点猛打了一阵枪，然后开展政治攻势。符一掌指挥乡队向天打枪，佯作还击一阵之后，便举起了白旗，共交出30多支步枪和1000多双布鞋以及一批粮食。战斗结束后，中共西北区委派邓如仁护送符一掌回家乡，后来安排他到西区港门教书；其他乡兵则全部遣散回家。

在此期间，马观福、周锡经二人按照区委的部署和分工，在槟榔界一带进行恢复老区和开辟新区工作的同时，还深入到老麦田、古村东两个保公所（两保组织有联保武装），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设法瓦解反动势力。后来，区委书记叶卓锋又和马、周二人深夜潜入老麦田和古村东，直接找联保主任徐春田、副主任徐文林和其他乡绅族老谈话，向他们宣传革命大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晓以利害，劝他们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尽快脱离国民党，不再与共产党作对，不再与人民为敌。徐春田等人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加上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八团等主力部队转战高雷各县，迭获大捷，军威大震，因而徐春田等人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处境和命运，当场表示愿意将功赎罪，并答应为中共地方党组织提供情报和粮食。这样，老麦田和古村东的反动联保武装，也就被分化瓦解掉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敌分化瓦解斗争和对统战对象的教育争取工作，终于全部消灭了西北区范围内的国民党乡、保政权和反动武装。至1948年12月，西北区已成为由共产党控制的小解放区，成为遂溪人民革命斗争的后方基地。

四、加强解放区建设 支援大军解放雷琼

（一）保十团起义后的形势变化

1948年夏以后，粤桂边区的国民党反动派由于处处挨打，其派系之间互相倾轧，致使内部矛盾日益加深，并且逐渐表面化。当时，驻遂溪城国民党广东省保警第十团在全国革命形势的促使和共产党有关政策的感召下，极力反抗上峰和异系军队的排挤，由团长陈一林率领，于1948年12月19日在遂溪城起义，毅然参加革命行列，并当场击毙前来遂城点验兵员和召开军事会议的粤桂南区清剿指挥部中将副总指挥兼广东第十清剿区司令张君嵩、第十清剿区少将副司令邓伯涵及其他官兵40多人。接着，起义部队乘胜进军湛江市赤坎，袭击国民党广东第十清剿区指挥部，进一步扩大起义的影响。继保十团起义之后，国民党遂溪县义和乡乡长杨起德又于1949年1月28日率乡队50多人起义，并解除国民党遂溪县自卫队30多人的武装。这两次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进一步动摇了当地国民党的反动营垒，推动了雷州半岛的革命形势。人民武装乘势出击，仅半月时间，便在遂溪摧毁了20多座敌炮楼，解放了5个乡镇。

其时，西北区解放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除原有区、乡脱产武装外，全区的非脱产

村队迅速发展至近 9000 人，农会会员猛增至 2.9 万之众，党组织和人民政权也得到快速发展。保十团起义后，很快便转移到西北区。中共西北区委为了做好迎接起义部队的工作，以利于稳定起义人员的思想情绪，因而发动全区人民掀起捐献热潮，不仅在粮食方面尽量满足起义部队的需要，同时在其他方面亦给予热情的帮助和照顾。

1949 年 4-5 月间，中共遂北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先后在中区苏二村和西北区老马村附近举办了两期区委及大乡党支部书记学习班，每期半月，约 20 人，主要是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进行正面教育。尔后，西北区委根据遂北县委的部署，在本区举办党员学习班，开展全区性的整党整风运动。这时，西北区党组织已作了调整，区委领导班子由 7 人组成，各区委成员的分工如下：李炳任区委书记(原区委书记叶卓锋调到遂北县委负责群运工作)，张立明兼任区长(原区长周锡经调到遂北县委负责税务工作)，马观福为组织委员兼区农会长(原区农会长叶大茂调到遂北县委负责农会工作)，李炳球兼任界东乡党总支部书记，李志严兼任界南乡党总支部书记，叶高兼任北联乡党总支部书记，邱毅兼任区妇女党总支部书记(原总支部书记林英调到遂北县委负责妇女工作)。

(二)加强本区建设 大力支援前线

1949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淮海、辽沈、平津三大战役胜利，解放了长江以北地区之后，接着便渡江南下，追歼溃敌，解放华南，以夺取全国的胜利。其时，西北区已是一个解放区，其任务除了建设好本区之外，还要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搞好支援前线工作。

一是积极为地方主力部队输送兵员。1949 年 2 月，遂北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把县属东、中、西、北、西北等 5 个区的独立连(或区中队)集中起来，整编成立遂北县独立营。这时，西北区独立“飞鹰”连约 100 人枪，被整编入遂北独立营。同年 6 月，遂北独立营与遂南独立营合编成立粤桂边纵队第二支队第五团。不久，西北区又向第五团输送了 70 多人枪。至此，西北区已先后为主力部队输送了 6 批兵员(含 1947-1948 年输送的 4 批兵员)，共约 330 人枪。这对于加强主力部队的战斗力，支援外区的革命斗争，都起到了不少的作用。

二是继续开展“双减”和调耕运动。这是西北区解放区内一项经常性并较为长期的工作。当时，西北区的形势与 1947 年的“大搞”武装斗争时期已大不相同，不仅消灭了本区内的反动据点和政权，同时区外反动武装的侵犯骚扰也大大减少了。因此，土豪劣绅和地主已完全失去了代表其利益的“靠山”，不敢再征收租息；而广大人民群众则

逐步树立了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要求彻底解放及平等自由的思想 and 行动，也日益强烈和自觉。由于这样，减租减息和调耕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效果也极为显著。

三是发展生产，积极筹粮，支援部队。1949年是雷州半岛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鼎盛之年，仅遂溪县就先后发展了2个独立营和3个主力团，因而需要大量的军粮，加上南下大军正长驱直下，必须准备足够的粮食，以便保障南下大军的粮食供给。因此，西北区人民与全县人民一样，肩负着艰巨的筹粮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西北区委和区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一方面发动群众捐献粮食，一方面发展生产筹备粮食。1949年6月，中共粤桂边区党委发出“进行党员捐献运动”的号召之后，西北区党组织闻风而动，全体党员竞相捐献。在党员的带动下，广大群众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全区性的捐献热潮。同年夏，区委、区政府布置张立明、叶高等人专门负责开荒生产工作，组织区乡工作人员在北联乡天鹅墩垦殖荒田近50亩，3个月后收获稻谷2万多斤。这批粮食，在南下大军开抵南路时，全部供给大军。

(三)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争取尹爵卿起义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西北区党组织一贯重视统战工作，并且比较讲究策略和方法。早在1947年，西北区委就研究制定了对国民党乡长张德安及邻县廉江永桐乡长尹爵卿等人的统战工作方案，决定对张德安采取“打”和“逼”的办法，对尹爵卿则实行“和”与“拉”的措施。结果，尹爵卿一直与西北区党组织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从不出兵进犯西北区，但与西北区党组织依然保持着一定距离。1948年，界炮乡长张德安垮台和符一掌投诚以后，这对尹爵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陈一林、杨起德等人相继率部起义，受到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更使他从中了解到共产党的投诚起义政策。1949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政治部发出《告国民党军队官兵书》，呼吁国民党官兵认清形势，顺应革命潮流，将功赎罪，投向人民。这对于促进尹爵卿起义，又一次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了争取尹爵卿早日起义，西北区党组织继续利用何杰才与尹的关系，并先后派出叶高、莫兴祥、莫嗣谟等人，不断地做尹的统战工作，向他大力宣传革命大好形势和共产党的有关政策，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败局已定，劝他不要再犹豫，及早作出抉择，毅然起义，走向光明。尹爵卿在西北区党组织的积极教育争取下，一方面考虑到张德安如此反动，其据点又如此坚固，尚且弃官逃命，如果自己再执迷不悟，必然重蹈前者覆辙，后果将不堪设想；另一方面，他考虑到全国已经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彻底失败，高

雷地区有不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已相继投诚起义，自己也应顺应潮流，寻找出路。于是，他决定携械起义，投向人民。1949年10月下旬，尹爵卿率部携械到达西北区，要求当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接受其起义。西北区区委书记李炳代表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向尹表示热烈欢迎。尹爵卿把永桐乡公所枪支弹药全部移交给人民政府之后，西北区委、区政府把一份由雷州人民行政督导处主任陈开濂签署的接受起义公文交给尹爵卿筹人。

(四)广泛发动群众 全力支援解放海南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之后，雷州地区人民武装在中共雷州地委的领导下，乘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横扫华南国民党军的强劲东风，展开了全面解放雷州半岛的战役。1949年10月下旬，人民武装解放了徐闻；11月28日，又攻克了国民党遂溪县政府所在地城月镇，解放了遂溪全境；次月，又接连解放了海康县和湛江市。至此，雷州半岛全境解放。雷州半岛解放后，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支援南下大军解放海南岛的热潮之中。

为了更好地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支前工作，遂溪县(遂南、遂北两县已于1949年8月合并)于1949年11月3日成立了支前司令部，同时各区也成立了支前司令部。西北区支前司令部司令张立明，政委李炳。西北区支前机构成立后，随即组织工作队，深入各乡村，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组织人、财、物力，全力支前。

西北区在宣传发动群众支前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积极分子。分工负责管理督促修船工作的黎锦典、张南隆二人，日夜奔走于沿海各村，寻找船主，动员船工。尤其是张南隆，他不仅竭力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还亲自修理船只，安装桅杆、船舵、风帆等。莫兴祥、李明、周锡勇、邓成州、邓如仁等负责人更是日夜操劳，以身作则，为了动员和组织船工，他们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还有一位姓吕的女教师，她不惜放下教师的架子，不怕别人说闲话，毅然到沿海去，为船工挑水做饭。由于他们不辞劳苦地埋头工作，完成任务比较出色，因而受到《南路人民报》的通报表扬，称赞他们具有“对革命工作不辞艰苦的伟大精神”。

全区的捐献热潮首先是从织笏村掀起的。织笏村是一条只有32户人家的小村子，田地较少，粮食缺乏，村民平时都靠编织竹笏换钱买粮，生活比较贫困。然而，该村在党发出捐献财物支援前线的召号后，却能率先响应，居然在一夜之间捐集了66元光洋，远远超过了预定捐献指标，为预定数额的12倍。这一喜讯，在西北区引起了共振。于是全区200多条自然村的群众，纷纷竞相捐献，掀起了全区性的捐献热潮。区支前总站

交通员卢光，把多年来为人放牛攒得的5斗谷子变卖，将换来的2块多光洋全部捐了出来；交通员何张则把家私什物卖掉换钱献捐；穷先生刘国藩也不甘落后，把家里仅有的2担稻谷全部捐出支援大军……象这样竞相捐献的好人好事，在西北区处处可以耳闻目见。由于广大群众的积极捐献，全区从11月5日至15日止，仅10天就捐集了2300多元光洋，1.1万多斤稻谷和3枚戒指，总值为原定指标的2倍多，完成任务最出色，位居全县各区之首。

除积极捐献粮款之外，西北区人民还捐献了一大批草料、木材和衣物、被服等，出动大批民工修筑公路和桥梁，并组织许多船工和舵手，协助大军强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西北区人民在这次支前工作中，全面动员，竭尽人力、财力、物力，为海南岛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附 录：

西北区党组织 及其领导人更迭表^①

一、中共西区（含西北区）委员会

（1939. 10—1942. 秋）

书 记 殷 英 （1939. 10—1940. 9）

沈汉英 （1940. 9—1941. 2）

陈希古 （1941. 2—1942. 秋）

委 员 黄明德 （1939. 10—1940. 2）

王玉引 （1939. 10—12）

马如杰 （1940. 9—1942. 秋）

二、中共西区（含西北区）特派员

（1942. 秋—1944. 8）

特 派 员 陈希古 （1942. 秋—1943. 2）

陈兆荣 （1943. 3—1944. 8）

领导成员 唐协森 （1942. 秋—1943. 2）

陈 章 （1942. 秋—1943. 2）

马如杰 （1942. 秋—1944. 8）

梁 甫 （1942. 秋—1943. 2）

陈理祥 （1942. 秋—1944. 8）

李绍香 （1942. 秋—1943. 2）

^①因缺乏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关具体资料，故本表及以下的“人民政权”、“人民武装”二表，均只列抗日战争时期以后的情况。

三、中共西北区委员会

(1944. 8-1946. 3)

书 记 陈 章 (1944. 8-1945. 2)

周 斌 (1945. 2-1946. 3)

委 员 郑贤儒 (1944. 8-1945. 2)

四、中共西北区特派员

(1946. 4-1947. 5)

特 派 员 李晓农 (1946. 4-1946. 8)

领导成员 梁 甫 (1946. 8-1947. 5, 负责涧水河北部)

何 珍 (1946. 8-1947. 5, 负责涧水河南部)

五、中共西北区委员会

(1947. 5-1949. 12)

书 记 何 珍 (1947. 5-7)

梁华栋 (1947. 7-12)

叶卓锋 (1948. 1-1949. 5)

李 炳 (1949. 5-12)

委 员 周锡经 (1947. 5-1949. 4)

梁 甫 (1947. 5-12)

陈耀南 (1947. 5-7)

梁乔栋 (1947. 5-7)

李超儒 (1947. 5-7)

周锡典 (1947. 7-1948. 5)

叶大茂 (1948. 1-1949. 5)

张立明 (1948. 1-1949. 12)

林 英 (1948. 1-1949. 5)
李 炳 (1948. 1-1949. 12)
马观福 (1949. 5-12)
李志严 (1949. 5-12)
叶 高 (1949. 5-12)
邱 毅 (1949. 5-12)
李炳球 (1949. 5-12)

(一)界东乡党总支

书 记 李 炳 (兼, 1947. 7-1949. 5)
李炳球 (兼, 1949. 5-12)

(二)界南乡党总支

书 记 叶大茂 (兼, 1947. 7-1949. 5)
李志严 (兼, 1949. 5-12)

(三)北联乡党总支

书 记 马朝龙 (兼, 1947. 7-12)
张立明 (兼, 1948. 1-1949. 5)
叶 高 (兼, 1949. 5-12)

(四)西北区妇女党总支

书 记 林 英 (兼, 1947. 9-1949. 5)
邱 毅 (兼, 1949. 5-12)

西北区人民政权机构及其领导人更迭表

一、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

(1945. 2-8)

区 长 全德珠
副 区 长 郑锡康 (郑南)

文 书 马朝伟

总 务 梁乔栋

财 务 肖光章

(一)第一联防区办事处

主 任 叶大茂

(二)第二联防区办事处

主 任 李毓淮

(三)第三联防区办事处

主 任 李琼伦

(四)第四联防区办事处

主 任 潘立中

二、西北区人民政府

(1947. 5-1949. 12)

区 长 周锡经 (1947. 5-1949. 4)

张立明 (1949. 4-12)

副 区 长 梁乔栋 (1947. 5-7)

区 干 部 马朝龙 (1947. 5-1948. 1, 秘书)

潘立中 (1948. 1-1949. 12, 管财经)

袁 玲 (1948. 1-1949. 12, 管武装)

马成儒 (1948. 1-1949. 12, 管交通情报)

马观福 (1948. 1-1949. 5, 开辟新区)

(一)界东乡人民政府

乡 长 李毓淮 (1947. 5-1948. 10)

周 韩 (1948. 10-1949. 12)

(二)界南乡人民政府

乡 长 李志严 (1947. 5-1948. 1)

杨晋祥 (1948. 1-1949. 12)

(三)北联乡人民政府

乡 长 莫兴祥 (1947.5-1949.12)

西北区主要人民武装序列表

(1943-1949)

界炮乡抗日自卫队 (1943.春成立)

队 长 陈炳崧

豆坡乡抗日自卫队 (1943.8 成立)

队 长 钟羨余

事 务 长 何 珍

山内抗日常备队 (1943.8 成立)

总 指 挥 李鸿基

队 长 郑世英

副 队 长 李仁廉

指 导 员 陈慎辉

山家抗日常备中队 (1944.春成立)

中 队 长 李绍香

事 务 长 洪 德

第二区抗日联防中队 (1944.春成立)

中 队 长 杨起德

北潭抗日常备中队 (1944.春成立)

中 队 长 全德秋

老马起义大队 (遂溪人民抗日联防大队, 1944.8 成立)

大 队 长 马如杰

政 委 陈兆荣

参 谋 林 杰

第一中队

中队长 洪荣
指导员 陈慎辉

第二中队

中队长 郑世英
指导员 李绍香

第三中队

中队长 李鸿基
指导员 李晓农

张鸿谋抗日独立中队（1944. 9 成立）

中队长 张鸿谋
副中队长 李康绪
指导员 李琼伦
李恒生（后）

陈永哉抗日中队（1944. 9 成立）

中队长 陈永哉
指导员 肖光章
教官 郑世英

李秋抗日中队（1944. 10 成立）

中队长 李亚秋
指导员 何珍
事务长 李毓淮

沿海抗日区队（1944. 10）

队长 全康傅
指导员 陈慎辉

金围抗日联防大队（1945. 春成立）

大队长 张鸿谋

区抗日警备大队（1945. 4 成立）

大队长 张鸿谋
政委 李绍香

李晓农便衣队（1945. 冬成立）

队 长 李晓农

何珍别动队（1945.冬成立）

队 长 何 珍

陈永哉情报组（1945.冬成立）

负 责 人 陈永哉

占景隆小分队（1945.冬成立）

队 长 占景隆

张耀经济队（1945.冬成立）

队 长 张 耀

区武装中队（1946.8成立）

中 队 长 李晓农

副中队长 周锡典

郑贤培

指 导 员 陈 冬

区第一中队（1947.4成立）

中 队 长 叶大林(8月后张弟)

副中队长 张 弟

指 导 员 郑杨兆

区第二中队（1947.4成立）

中 队 长 阿 曲

副中队长 王其森

指 导 员 王炳旺

区扩军队（1947.8成立）

队 长 叶大林

飞鹰连（1948.4成立）

连 长 袁 玲

指 导 员 马成彬

编后话

中共遂溪西北区革命斗争史，是中共遂溪县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全面、系统地征集该区的革命斗争史料，中共遂溪县委党史研究室（原党史办）先后于1983年9月、1986年2月，邀请当年曾在西北区从事革命活动的部分老前辈开座谈会，重点征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该区的革命斗争史资料。参加这两次座谈会的老前辈有陈开濂、何珍、梁乔栋、叶卓锋、梁甫、张立明、周锡经、李超儒、李炳、叶大林、林英、潘立中、袁玲、张耀、李炳聪、李炳煜、袁荣英、叶高、李豪等人。两次座谈会后，张藜同志根据座谈记录和张鸿谋、梁华栋等老同志的回忆材料，以及有关历史档案、文献、报刊资料，按该区的革命斗争历史进程，分时期、阶段、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于1986年12月编写出《遂溪县西北区革命斗争史草》（1937—1949），并分别送给30多位老同志审阅，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了老同志的补充修改意见。由于该史稿初时只作“存史”之用，故未能作进一步修改眷印。2002年3月，遂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根据老同志及有关人士的要求，邀请黄明德、何珍、李炳、林英、叶高、许裕、邓如善、李明等老同志，举行了为期4天的审稿会，对史稿的史实进行反复核实和校正。座谈期间，张志、何成华、陈荣等县委、县政府领导在百忙中抽身参加了会议。其后，张有同志再次对史稿进行全面修改，遂成本书稿。

在编写、出版本书的过程中，承蒙遂溪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广大老同志的热情关怀，遂溪县北潭镇、界炮镇、沙古镇党委和县电力工业局、农业局、教育局、建设局、社保局、环保局、城市管理局、界炮镇供销社等单位 and 部门的鼎力资助，值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本书的错漏之处尚多，诚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者

2002年8月20日